

威權體制與失控的執行者：從情治檔案重探臺大哲學系事件 說明

發生在 1970 年代的臺大哲學系事件，經歷三年，前後共造成十三位教師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固然另有安排，但亦有人自此覓職不順、潦倒而終，多數人後續的職涯發展皆受到影響。儘管臺大終在九零年代組成調查委員會，在 1995 年完成《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由校長致歉、後有賠償，部分人並得以復職；監察院於翌年亦有相關調查。但對於此案的來龍去脈，仍有諸多未明之處。當年重啟調查時，積極配合受訪的多為受害人方面，加上當年臺大進行調查之時，政府機關多拒絕提供相關檔案，是以該報告對於介入校園的「外力」僅能簡略處理。爾後，雖有部分檔案陸續出土，亦有碩士論文以此材料為題進行整理，但相關成果尚未為當事人乃至社會知曉。

促轉會在成立之後，在檔案局新徵集的第六波政治檔案中，發現調查局的相關案卷；後亦在本會積極協調解密，終於完成移轉的國安局檔案中，發現過去彙整情治機關資訊的上層單位亦留有相關案卷，遂委由林易澄博士進行此批新檔案的解讀研究，希望能推進對於此事件輪廓之描繪，這份研究以檔案解析為主，若遇有檔案內含重要資訊需與當事人核實處，方評估是否進行訪談。涉及本案的黨政情治機關高層多已去世，關鍵人物孫智燊，雖曾在當年接受臺大調查委員會訪談，但其後去美多年，皆未能完成訪談。

本文初稿完成後，曾於 2020 年初，召開諮詢會議，邀請當事人李日章、林正弘、趙天儀教授，以及當年臺大調查委員會召集人楊維哲教授出席，他們對於報告與此批檔案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至本文結尾提出的檔案徵集建議，促轉會將持續努力進行，也期待在越來越多新資料出土的情況下，能持續帶動更多研究或報導，推進我們對於威權體制下，政治介入高等教育場域之模式與影響的認識。

威權體制與失控的執行者：從情治檔案重探臺大哲學系事件

林易澄*

- 一、先前對哲學系事件的調查與研究概況
 1. 事件經過概述
 2. 明顯卻又缺少檔案材料佐證的「外力介入」
- 二、調查局與國安局檔案中所見的新線索
 1. 教育部的角色、最初意圖，以及調查局關係
 2. 孫智燊與馮滬祥、心廬的關係：〈緊急座談會記要〉的傳發過程
 3. 王昇與李煥之爭：調查局對香港雜誌《七十年代》剪報的批註
 4. 蔣經國的角色
- 三、從目前檔案材料推估的案情輪廓：三個不同層次案件的交錯
 1. 第一個案件：警總約談陳鼓應、王曉波
 2. 第二個案件：偶然到任的孫智燊將哲學系編織進國際性赤色陰謀
 3. 第三個案件：王昇心廬體系藉機攻擊閻振興、蔣彥士、李煥
 4. 案件的突然中止
- 四、案情綜觀：哲學系事件在戰後校園政治案件史上的位置
 1. 案情綜觀
 2. 1974 年變動中的黨國結構：與 1966 年殷海光解聘、1986 年李文忠退學比較
 3. 超過體制的偏執：黨國意識型態與現實之間荒謬的距離
- 五、小結：討論責任的開始和有待日後徵集的檔案

1972-74 年臺大哲學系事件發生，距今 46 年，被視為威權時期政府介入學術界的代表性案件，解嚴後也由臺大校方重啟調查，但由於缺乏政府方面檔案，對於外力如何介入，始終未能釐清。雖然尚欠缺高層決策資料，本文透過政府新徵集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以下稱調查局）與國家安全局（以下稱國安局）檔案，對外力介入中各方運作，作出一較為清楚的初步分析。第一節說明先前調查研究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概況，以及探究外力介入的困難。第二節討論兩局檔案中幾個重要的新線索。第三節，就新線索重新勾勒哲學系事件的輪廓，指出本事件實為三個案件與兩股外力的交錯。第四節，對案情進行評估，並放在戰後校園政治案件的歷史軸線上，予以比較。最後，評估責任歸屬與有待徵集的其他機構檔案。

一、先前對哲學系事件的調查與研究概況

1. 事件經過概述

1970 年代初期，肇因於保釣運動，引發臺大校園的學運聲浪，導致校外政治力量關注，並在校內有心人士操作下，使臺大哲學系發生多起人事糾紛，前後造成十三位教師去職。

這段時期的政治歷史背景，在外，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外交上接連挫折（退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北京）；在內，則是國民黨政權內部的交接，元老環視下，準備接班的蔣經國希望獲得青年支持，鼓勵青年關心國是，例如《大學雜誌》，當時一般認為有救國團在背後支持。這股背景，在青年思想上，匯聚於保釣運動。愛國、民族主義使之合理化，也助長了學生的聲勢。但是，學生運動進一步發展至對政府的批評，出現超過政府許可範圍的勢態。當蔣經國權力鞏固後，也對日益衝擊秩序的大學校園，反過來意圖加以整頓，進行思想控制。¹臺灣大學的自由學風，是政府關切之處。特別是哲學系。過去有《自由中國》的殷海光（在壓力下 1966 年臺大不再續聘），此時則有其學生陳鼓應、王曉波任教，陳、王並與校園學生運動關係密切，更受到當局重視。²

哲學系事件可分三個階段：

階段一：1971 年，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講師王曉波發表言論批評當局，主張設立言論廣場，並在校園推廣保釣運動。1972 年 4 月，政府方面已經試圖

¹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

²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臺北：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自印本，1995 年 5 月），頁 6-8。

降溫輿論，《中央日報》刊出擁護政府社會穩定優先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1972年12月4日，臺大大學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陳鼓應反駁《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遭到哲學系研究所學生馮滬祥發言反對，雙方展開爭論，哲學系四年級學生錢永祥則聲援陳鼓應，要求「大家不要聽職業學生的話」。隨後，馮具文向臺大校長閻振興告狀，臺大訓導處發文要求哲學系代主任趙天儀解除陳鼓應導師職務，錢永祥也以「荒謬中傷同學」為由受到記大過一次的處分。對此，代系主任趙天儀認為不合規定，訓導處之措施已經破壞導師制度之推行。

1973年2月12日，錢永祥與考古人類學研究所學生黃道琳被警備總司令部約談。隔日，警備總部搜索陳鼓應住處。陳鼓應與王曉波隨後遭警總拘留，罪名是「為匪宣傳」。陳鼓應及王曉波隨後由臺大校長閻振興具保釋放，陳在學期結束後便未獲臺大聘書，轉任政大國關中心，王則續聘一年，於1974年6月以後不再續聘（見階段二）。

1973年6月，馮滬祥參加理則學期末考試，六題全錯，任課講師楊樹同給予零分，無法畢業。馮滬祥四處具狀陳情，哲學系召集諸位老師核對成績，確定為零分，馮滬祥威脅楊樹同必須讓他及格，提及「而今看來系務整飭在即」。趙天儀與楊樹同主張將馮交給懲戒委員會懲戒，惟訓導長俞寬賜面談，表示校長希望學校如同大家庭，教誨即可，不須處分。

階段二：前一階段，趙天儀未配合處理系務，導致1973年6月被校方解除職務。在前任系主任成中英推薦下，由美國南阿拉巴馬州大學助教授孫智燊回臺客座一年，接任代系主任。

孫於1973年7月回臺，8月接掌系主任，獨斷系內一切課程與人事安排。多次表示受「當局」指派來整頓哲學系。先前已獲文學院同意改聘為專任的四位兼任講師李日章、胡基峻、梁振生、楊惠男，為孫否決，兼任講師陳明玉也不續聘。同時聘任與孫往來較多的楊政河、游祥洲為專任講師（兼新設行政助理），張永雋為兼任講師。並改變原先課程安排，不批准王曉波「儒家哲學」、楊樹同「哲學概論」開課。此外，孫並指控晚上口渴到辦公室喝茶的梁振生為小偷，指成中英發起的「中國哲學討論會」為非法組織。

孫的行事引起許多系上教師不滿，1973年9月7日，九位教師（曾天從、趙天儀、劉福增、張瑞良、林正弘、楊樹同、黃天成、郭實淪、王曉波）聯名向校長閻振興報告，提出意見書，要求召開系務會議，公開人事，公開課程，廢止行政助理。對此，閻振興決定暫時凍結哲學系人事。

之後，孫於1974年3月28日，召開「哲學系緊急座談會」，會中指稱成中英在美國主編《中國哲學研究》，刊登中共哲學文章並作按語，是為匪宣傳，乃是中共同路人。孫並指控成與美國左傾的費正清集團有所聯繫，而整個哲學系、文學院、臺大都有赤化危機。隨後，《自立晚報》副刊登載該座談會相關消息，並參與批判，之後《新知識》雜誌在7月刊出座談會記要全文，進一步擴大攻擊指向臺大校長與教育當局。

1974年6月，孫列出不續聘名單，包括多位先前提出意見書的教師。孫違反慣例，越過文學院送交臺大人事室。儘管部份教授與系所主管表示反對，最終，校務會議上，閻校長留任顯得較無政治問題的兩位（林正弘、張瑞良），仍然將其他名單上教師不予續聘（趙天儀、王曉波、楊斐華、游祥洲）。此外，兼任講師李日章、胡基峻、梁振生亦去職。隨後，孫於客座一年期滿後返回美國。

階段三：黃振華接任系主任，於1975年不續聘前一年已經列在孫氏名單，但最後仍續聘的黃天成、郭實淪，並另行不續聘鐘友聯、黃慶明兩位兼任講師。

3

2. 明顯卻又缺少檔案材料佐證的「外力介入」

解嚴後，哲學系事件的調查報告與較整體處理本案的學術研究，有以下三份：

- (1)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1995年5月）
- (2) 監察院，《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1996年3月）
- (3) 游欣璇，〈臺大哲學系事件之研究〉（2011年6月，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³ 三階段之概況，見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14-31。

但是，受限於以下兩點，臺大這份調查報告對於「外力介入」的調查成果仍然有限：在政府檔案方面，當年情治機關多不提供相關檔案，主要利用的以臺大校方檔案為主；⁴在口述訪問方面，受害人多踴躍回應，但加害者、情治單位、黨政高層則多表示沒有參與、不復記憶。

因此，臺大報告主要的成果，在於釐清臺大校方在行政程序、學術倫理、言論自由與人權方面的責任。儘管臺大報告指出「強烈感受到整個事件有校外勢力干預」，「以上這些都指出孫智彞所作所為背後，受到臺大以外的勢力支持」⁵但是多只能由校內人士被干預的情況來作推論，⁶並從〈緊急座談會記要〉在《新知識》等雜誌之流傳與補充加工，推測孫智彞與王昇心廬體系的關聯⁷：「孫智彞雖然不是國民黨員，但顯然和國民黨內的某一派系合作，並且可能成為國民黨內部派系權力爭鬥的一粒棋子。」⁸與此相近，監察院的約訪也沒有任何突破，只能指出「似有外力介入跡象，但均無法提出確切有力證據。」總體而言，雖然外力干預極為明顯，但是缺乏檔案與口述材料，很難說明外力具體的運作細節。在報告末尾，臺大調查小組總結：

哲學系事件的發生固然有其一定的時代背景，但經採證與研判，小組認為整個事件的發生，乃是三種力量的結合，而不是單純的外力干預，……分別是：1) 哲學系內部的人士：尤其是孫智彞與馮滄祥的意念與氣質、2) 臺大校方的人士：尤其是閻校長的自我定位與風骨、3) 校外政治勢力：尤其是從蔣經國到其他情治政工系統的政治信仰與企圖。⁹

日後，部份官方檔案解密並被移轉至檔案局，游欣璇的碩士論文對此進行研究，特別利用了兩份調查局與教育部內部報告，¹⁰但由於缺乏各方具體運作檔案，

⁴ 此外，教育部相關檔案已銷毀。2005年教育部整理檔案發現，哲學系事件相關檔案已經在1993年7月遭到銷毀。由於當時臺大已經宣佈成立調查小組，王曉波質疑時間點頗為巧合。〈四六、哲學系事件檔案悄悄遭銷毀〉，《中國時報》，2005年3月14日。

⁵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122，124。

⁶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122-124。

⁷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32-37，71-85。心廬：國防部心理作戰研究班，由當時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王昇主導。

⁸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37。

⁹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124。

¹⁰ 司法部行政部調查局，〈臺灣大學文學院哲學系重要動態研析專報〉（1974年1月14日），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63/C280212/0001/01/007；教育部編，〈臺灣大學哲學系近況概述〉（1974年

以及關鍵的心蘆材料，仍然難以釐清外力干預的運作情形。該文最終亦只能模糊地概括所謂的外力：

臺大哲學系事件確有政治力的介入，而且涉入的層級與單位龐雜。但是整起事件的發生，並非由某一單位的主導，而是國民黨政權為了壓抑校園內不斷上揚的民主改革熱潮，以向來熱衷於學生運動的陳鼓應、王曉波為首要目標，而展開的整頓工作。在警備總部採取了實際約談行動之後，其他相關單位及關係人，各自解讀上意，並以其主觀思維介入其中，所產生的果。尤其是孫智彥、閻振興二位主事者的個人因素，所造成影響最為關鍵，……終於導致多位教師被迫離開的結果。¹¹

二、調查局與國安局檔案中所見的新線索

先前，臺大調查小組報告與游欣璇的研究，已在歷史材料限制下，試圖描繪整體的圖像框架，指出了政治外力、校內因素的交錯互動。但是，也因為缺乏校外情治單位乃至政治高層的檔案，只能做出大略的推測與勾勒，而不能證實，更難對細部的運作做出回答。

本次，隨著第六波檔案的徵集的成果，加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稱促轉會）協調國安局檔案解密有成，新出土的本案檔案有二：¹²一是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內容約 370 頁，包括調查局對臺大哲學系之監控與相關往來公文，時間起自 1973 年 8 月，下迄相關人物後續監控情資，直到 1987 年 9 月為止；二是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為案件主要相關內容，時間起自 1973 年 7 月，下迄 1974 年 9 月。國安局檔案另包括兩份個人監控檔案。「陳鼓應」卷宗，主要是陳 1973 年解聘後的監控資料，與本案直接關係較弱。「王曉波」卷宗，時間為 1971 年 10 月至 1991 年 1 月，除後續監控資料外，由於王較陳晚解聘一年，呈現較多 1973 年哲學系務的情況，可與兩局「臺大哲學系事件」

9 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0063/C280212/0001/01/005。

¹¹ 游欣璇，〈臺大哲學系事件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6 月），頁 123。

¹² 調查局檔案卷宗已經數位化並有編號，本文引用時使用新編號。國安局檔案卷宗仍為複印紙本未編號，引用時使用原始公文號。

卷宗相參照。這些檔案，由於機關在情治體系內的位置不同，其中資訊重要者大致如下：

- (1) 調查局檔案，該局屬於情治體系的中層單位，內容主要為情資收集與監控工作，並不直接參與對臺大哲學系的決策。但是這份檔案仍然相當有幫助，記錄了孫智燊與調查局的接觸狀況，一定程度上釐清了過去哲學系事件模糊之處：情治體系如何與校內人士聯繫起來？
- (2) 國安局檔案，則揭示情治體系的較高層單位運作，內容約有 75% 為教育部人事處（人二室）聯繫的調查局函件，經調查局轉呈國安局。另外 25%，包括兩部份：一、國安局內部文件，多是對本案的相關分析，或對媒體剪報的評論。二、警總調查室的呈報，主要是針對先前已經被警總正式約談的陳鼓應、王曉波，釋放後生活狀況情報。由於教育部「哲學系事件」檔案已經銷毀，國安局檔案所留，雖無法呈現教育部內部細節情況，但可大致呈現教育部在案件中的態度立場，對於釐清案件中政府高層的運作，有相當幫助。

綜合兩局檔案，儘管對本家中黨政核心人物的面貌，仍未能完全掌握，但是對於先前調查報告、研究初步勾勒而尚未清晰探究的問題——在黨國威權體制之下，各層級情治單位之間與各自內部的紛雜互動、一定程度上外力干預的計畫預謀，卻又並不完全按照上頭計畫進行——已經可以得到更加清楚而具體的分析，並且進一步呈現出 1970 年代初期，臺灣威權體制控制能力變化的一些特徵。

本節將先介紹兩局檔案中一些新的線索與其意義，下一節則就目前所見材料，對案情作一重新評估。

1. 教育部的角色、最初意圖，以及調查局關係

首先，國安局檔案最重要的一點，是說明孫智燊與各黨政情治機關的聯繫究竟為何，同時也揭示孫智燊行事與教育部指示之間的落差。其次，調查局檔案從調查局內部視角，亦從側面對此落差做了補充。

教育部與臺大校方，在 1973 年上半年協商後，最終確定由孫智燊出任哲學

系主任，此時，孫與政府直接聯繫，是教育部秘書孔服農，孔屬於教育部人事處第二辦公室（人二室），職稱為教育部人事查核業務負責人，兼臺大安定小組執行秘書，¹³辦公室設於臺大校長室隔壁。¹⁴檔案中教育部人事處致調查局、並轉國安局的函件，對哲學系情況的了解，多來自孫氏撰寫之〈備忘錄〉。如 1973 年 9 月 12 日國安局一份公文所示：

孫智燊就三周來改組哲學系人事經過……感慨之，……重點有二：一為趙天儀，孟祥柯與美國費正清集團有所勾結，二為趙天儀運用多方關係在哲學系安排人事，企圖繼續把持操縱。……孫所撰之「備忘錄」未及繕正，即送教育部孔秘書服農過目，孔子複製轉調查局，特送本局參考。¹⁵

大致聯繫為：孫氏與教育部直接聯繫，教育部人二室又聯繫調查局、國安局。就此，孫氏一開始回國接受整頓臺大哲學系之任務，乃是在教育部體系內進行。比較孫氏備忘錄，以及 1995 年孫回答監察院的陳述，¹⁶孫氏多次口口聲聲所謂「中央」，工作上線應該是教育部（又由於教育部長兼任國民黨知青黨部主委，其聯繫也可以說包括國民黨部方面），而非直接與情治體系相連繫。¹⁷

那麼，教育部的意圖為何？儘管孫聲稱「奉教育部長之命來整頓哲學系」，

¹³ 見調查局，〈致國安局，續報臺大哲學系改組情形（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 年 4 月 30 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敬(春) 217537。

¹⁴ 據前臺大總教官張德溥回憶，「蔣經國先生指示我在台大工作期間，黨團均由我指揮，到任以後，黨部在台大早派有孔服農秘書，在校長室隔鄰辦公」見張德溥口述，洪三雄採訪，鄭鴻生整理，〈折戟沉沙（下）——張德溥在臺大軍訓總教官歲月的回憶節錄〉，《傳記文學》，80 卷 1 期（2002 年 1 月）。

¹⁵ 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3 年 9 月 12 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第三處(62) 2753。

¹⁶ 孫在備忘錄中記錄「(民國) 62 年 9 月 7 日 蔣(彥士) 部長約見孫主任談及臺大哲學系問題及改造，並勉孫主任安心努力工作」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 124。「當年教育部長蔣彥士，兼任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主任委員，蔣先生之秘書步天鵬（知青黨部秘書）告知：『中央為了處理臺灣大學哲學系發生之諸多事情，已成立了五人小組，成員為教育部長蔣彥士，司法行政部長王任遠，外交部長沈昌煥，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秦孝儀，調查局長沈之岳。』」見孫智燊於監察院調查報告中的陳述。

¹⁷ 此外，趙天儀在〈有關「臺大哲學系緊急座談會記要」的聲明〉（1974 年 4 月 20 日）中九人聯名一事，已經寫道「以後孫先生向同仁稱他是奉教育部長之命來整頓哲學系。」此一材料，或因為「外力介入」面貌模糊，先前調查/研究多未注意，在此適可作為佐證。見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附冊》，頁 155。並見教育部方面說法，「上述事件發生後……本部鑒於哲學系近年來所顯露之種種不正常現象有日漸嚴重之傾向，乃決定協助校方進行改組。六十二年留美學人孫智燊應國科會邀請回國擔任客座副教授，經本部與臺大洽商聘為該校哲學系代主任，著手系務與人事整頓之進行。」教育部編，〈臺大哲學系近況概述〉（1974 年 9 月），調查局「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檔號：0062=301=07242=virtual001=virtual001，0142。

但是「漸進改組系務人事減少自由主義之力量」與「編織政治案件」，兩者之間仍有一定差異。就兩局檔案所見，考察(一)1973年9月孫與調查局之聯繫，(二)孫與教育部之協商，(三)國安局此時關注重點，(四)當局對王曉波續聘之態度，可以看到教育部傾向前者。

(一) 孫與調查局關係

1973年8月，孫到任以來，與系上教員爭執不斷，8月底，他跳過孔服農，直接與調查局聯繫舉報哲學系已成國際陰謀據點。先前，孫自己的說法，是情治單位主動找他。¹⁸但調查局檔案指出，此時反而是孫主動與調查局聯繫。孫在1973年8月31日，主動請見調查局長，第三處副處長高明輝負責接見，並作記錄呈報局長沈之岳：

孫智燊係旅美學人，應聘返國任教者，八月卅一日來局面謁局長，由局長指定本處高副處長明輝接見，乃提供備忘錄，並表示意見。¹⁹

該次會面，孫氏指控臺大哲學系長期受人把持，並接受美國費正清集團的金錢資助，為中共的統戰根據地。其中，高明輝並指出，孫氏告訴他，此前已經與沈之岳會面過一次，「孫君曾謁局長報告哲學系目前情形，局長面允有機會見到教育部蔣部長或閻校長時，願對孫君加以支持。」²⁰本次似為孫準備完整材料後，主動向調查局作進一步聯繫。

調查局的回應頗為特別，值得注意。該文件與後續回應有二，態度一正一反：

- (1) 調查局內部報告指出，自殷海光以來，哲學系長期培植激進學生，早已是關切對象。孫的檢舉「實非出於一己之私，而政府對孫智燊之支持，即係支持其整頓臺大哲學系，粉碎共匪在臺大之統戰據點，實為當務之急」。「擬請趙先生（副局長趙作棟）將孫智燊檢舉案提『五人小組』報告，請貫徹臺大對

¹⁸ 外文系主任顏元叔質疑孫寫備忘錄動機，孫回答：「要是你當哲學系主任，看看會不會有安全當局來聯繫你，不是對你有興趣，而是對這系有興趣」。孫智燊，〈我在臺大被赤色份子圍攻！臺大哲學系「緊急座談會」紀錄〉，《新知識》83期（1974年7月1日），轉引自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35-36。

¹⁹ 調查局，〈主旨：臺大哲學系主任來局晉謁局長〉（1974年9月7日），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331-0337。

²⁰ 調查局，〈主旨：臺大哲學系主任來局晉謁局長〉（1974年9月7日）。

王曉波解聘案之執行，並全力支持孫君整頓臺大哲學系之措施。」²¹其後，調查局的參與，主要是繼續收集情資，監控哲學系是否受中共利用。此外，調查局也將孫納入線民，此後提及孫氏，公文上稱呼多是「運用關係孫智燊」。

22

- (2) 另一方面，調查局並不完全信任孫。調查局強化監控哲學系同時，也指出哲學系內部人事糾紛已久，孫的指控可能與此有關。例如 1974 年 3 月，孫公開批判成中英，在調查局內部線報中，便指出：

孫智燊明知有關成中英事中央交待不許發表，為何在此種座談會中吐露，殊有未當，會後學生互相探詢，為何以前沒有聽過成某的事？孫將成之文件向學生宣露，對學生心理不良反應和影響，頗值糾正和注意。……查臺大哲學系人事紛爭由來已久。該系主任孫智燊發表有關成中英資料，可能係出於人事紛爭。²³

調查局檔案也顯示，另派有一學生作為線民，監控孫氏在辦公室的言論。²⁴

孫的主動求見，與調查局「支持又監控」反應，顯示出孫並非調查局「自己人」。不僅如此，也顯示出「五人小組」之間的橫向聯繫似乎並不積極。教育部顯得並未主動將孫氏「整頓」哲學系的工作狀況，和調查局進行討論，乃至請求協助；因此，調查局對於孫氏到訪與其意圖也顯得難以判斷。檔案中，調查局主要的任務是監控哲學系狀況，並根據檢舉清查成中英是否真受中共利用。綜觀目前徵集到的調查局卷宗，並未看到，調查局有接到更高層指示，主動對哲學系羅織政治案件罪狀。

²¹ 調查局，〈主旨：臺大哲學系主任來局晉謁局長〉（1974 年 9 月 7 日）。先前，除了孫在監察院約談與高明輝在 1995 年文章，其他相關人士都否認五人小組存在，本檔案也證明了該小組的存在，只是本卷宗裡，尚無調查局參與小組開會的細節資料。關於「五人小組」，見註 16。

²² 「據本處文教組徐君納同志，運用關係孫智燊提供臺大哲學系內部詳情……」調查局，〈運用關係孫智燊提供臺大哲學系內部詳情案〉（1973 年 9 月 19 日），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294-0303。

²³ 調查局，〈臺大大學論壇社舉辦座談會情形〉（1974 年 3 月 21 日），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264-0268

²⁴ 調查局，〈臺大運用關係〉（1974 年 4 月 26 日），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224。在孫之外，調查局另佈有線民，化名為吳正大，身份是哲學系二年級學生。這份顯示另有線民的公文時間雖然是 1974 年 4 月，但從 3 月大論社座談會已經另有線報，其佈署應當更早於此。

因此，孫氏之主動聯繫調查局，反而顯示出教育部期望與孫氏執行的落差。正是因為孫氏在 1973 年 7 月到任後，處處感到碰壁，感到不受校方與教育部支持，才主動聯繫調查局。導致，高明輝的內部報告所指出，孫氏希望調查局長沈之岳，能在臺大校長閻振興、教育部長蔣彥士兩人面前支持自己的檢舉。²⁵

（二）孫與教育部的協商

與此同時，國安局檔案材料也顯示出這一點。1973 年 9 月，孫氏感到其「改革」不受校方支持，揚言辭職。教育部長蔣彥士（9 月 7 日）與教育部秘書孔服農（9 月 11 日）分別與之會談慰留。此時，教育部態度是，支持孫的改革，但不希望他過度發揮：

孫當即表示上中下三策，上策為徹底改造，引用新人，中策為整頓改善，逐漸引用新人，使主流增強，逆流衰退，下策為任其腐爛，……蔣部長未作裁決，但指示孫要努力，並爭取代院長之支持，閻校長及教育部將會全力予以支持。顯然蔣部長對上下策均不表贊同。²⁶

此時，黨國內部有不同動作，但基本態度變動不大，都以穩妥為主。一方面，國民黨青工會王唯農與孫氏商討，提議將孫氏指控妨礙改革的前系主任趙天儀調職教育部。（9 月 15 日）另一方面，此提議被臺大校長閻振興駁回：「由於學校已經開課，一切以寧靜妥適為宜，故人事問題暫告凍結。」（9 月 17 日）²⁷最後，孔服農與孫氏商談，孫同意「採納孔服農意見，以靜制動，無為而治，使主流增長，逆流衰退，不再大事改革。」（9 月 28 日）²⁸調查局所呈報告，結尾似更支持孫氏立場，但其評估也指出教育部、校方與孫氏之落差：「依目前狀況言，本學期孫主任無法發揮作用，欲求徹底改組，有待明年再行策劃矣。」²⁹

²⁵ 調查局，〈主旨：臺大哲學系主任來局晉謁局長〉（1973 年 9 月 7 日）。

²⁶ 國安局三處四科，〈調查局報，臺大哲學系改組經過情形，綜簽呈核〉（1973 年 9 月 27 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第三處 (62) 2899。

²⁷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3 年 9 月?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2) 敬 (春) 238704。

²⁸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3 年 10 月 9 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2) 敬 (春) 240317。

²⁹ 國安局三處四科，〈調查局報，臺大哲學系改組經過情形，綜簽呈核〉（1973 年 9 月 27 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第三處 (62) 2899。

（三）國安局關注重點

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亦從側面說明政府方面關注與孫氏想法之落差。教育部希望整頓哲學系，源自前一年王曉波、陳鼓應等在臺大校內鼓動學生運動的問題。從國安局與教育部人二室、調查局、警總之往返公文，可以看到孫氏到任之初，政府關注在於，如何妥善處理王曉波（此時陳鼓應已經離職，受安排於政大國關中心工作），減少其影響力。

如前所述，孫氏到任後，與趙天儀等教授在人事、課程安排產生糾紛，於1973年8月下旬編織國際赤色陰謀之論，指哲學系已經為赤色份子把持，向調查局檢舉。但是從國安局內部之分析，此時，對孫氏編織陰謀並不重視，仍視為哲學系內部殷海光、方東美兩派糾紛。唯基於壓制王、陳兩人，與先前不配合的趙天儀，基本態度是支持孫氏整頓。國安局分析：「王轉入趙天儀集團後，可能身不由己，無法擺脫控制，就今之計，應請警總對之嚴加約束，不得參與哲學系之多種糾紛。」³⁰並轉知警備總部「王續聘後言行態度頗為囂張，請貴部嚴予約束。」³¹

政府方面，有一紀錄值得注意：王曉波要求與人二室的孔服農談話，對孫氏指控加以辨白。王、孔於10月5、6日會面。談話紀錄中，王強調哲學系問題是學派之別，而非政治問題。並對孫氏明白以「治安機構」威脅同仁表示不滿。對此，孔當日並未正面回答，只說：「學術思想是與政治有連帶關係的，學術有好的，也有壞的，這一正反的辯證與發生作用，值得重視。」³²國安局內部對此則分析：「按學派即思想問題，學派不同產生思想衝突，故整頓臺大哲學系應為重點工作。」³³

此處，教育部人二室與國安局，一方面認為臺大哲學系的學派問題可能衍生

³⁰ 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3年9月27日），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原始公文號：第三處（62）2893。

³¹ 國安局致警備總部函（1973年10月3日），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原始公文號：（62）康寧4015。

³²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引述教育部人事處函，1973年10月24日，原始公文號：（62）敬（春）242439。

³³ 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3年10月31日，無原始公文號，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編頁號164-166。

不當思想，需要整頓，但另一方面，並未如孫氏編織的赤色陰謀，將學派與政治的聯繫，直接上升到政治上反對政府的政治叛亂問題。此外，國安局分析，並提出一觀察，王指孫主任與黨政及治安單位接觸，「是作試探了解，你們究竟給孫之支援是多少？」對此問題，國安局分析並無進一步說明有多少支援。惟表示「孫主任因無行政經驗，可能做得太露骨，孫現已接受他人建議採取逐漸淘汰方式辦理。」³⁴顯示出，一方面支持孫整頓哲學系，但又對之行動有相對保留。

（四）當局對王曉波續聘之態度

此外，政府方面，在此時也並未採取隔年的嚴厲手段。以王曉波續聘問題而言，該年 8 月 18 日，王曉波申請復職，稱警總約談過後，他「謹言慎行，以愛國熱忱體諒政府政策。並已獲得當局之諒解。」³⁵儘管孫氏反對，教育部人二室亦有疑慮，³⁶但臺大校長閻振興批示續聘一年，警總亦同意續聘。這一決定甚且使得調查局、國安局感到疑惑。調查局線報，指該年年初釋放後，警總曾請陳、王吃飯，並贈王稿費，此事傳開，外界均認為王為警總運用關係，王亦不加否認。故學校對王顧忌甚多。臺大生活管理組長蘇鳳皋稱，希望警總澄清此事。³⁷國安局亦回覆調查局：

臺大續聘王曉波乙案，乃純為解決其生活困難，當以不表示意見為宜，但如續聘後任其開課並使其繼續參與系務或學生活動，顯與當初處理本案之旨意未儘相符，敬請繼續協調教育部研處惠告。³⁸

後並批示：

警總政戰部廖祖述主任為何希望臺大續聘王曉波？內情不詳。……後擬向

³⁴ 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3 年 10 月 31 日。

³⁵ 王曉波，〈申請恢復教職公文（致系主任、文學院長、校長）（1973 年 8 月 18 日）〉，無原始公文號，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編頁號 204-205。

³⁶ 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3 年 9 月 7 日），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原始公文號：第三處 (62) 2728。

³⁷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1973 年 8 月 27 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2) 莊情字第 052843 號。

³⁸ 國安局，致調查局函（1973 年 9 月 10 日），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原始公文號：(62) 康寧 3748。

警總詢明真像。³⁹

警總則回覆國安局：

臺大閻校長決定續聘王曉波後，孫主任前來請疏導王曉波要安分守紀，不要參與學生活動，余應孫之請，乃囑人轉告王，王答稱照辦，遂告訴孫可以放心，聘書亦可具發。⁴⁰

由國安局檔案觀察，此時，一方面當局希望減少王曉波的影響力，但攻擊態度並未如孫氏之強烈。警總約談王曉波後，雙方似有一互相利用、同床異夢的默契，警總希望王就此安分，王也藉此自保，對外顯示他得到當局諒解。在1973年9月8日確定續聘後，王曉波且前往校長室向閻振興表達感謝，並稱：「將來臺大反派學生之不正常活動情形由我負責向學校報告。」⁴¹這一說詞，可從兩方面解釋。「由我負責」，一方面讓國民黨政權放心，一方面，則可能保有活動空間。與此同時，他對蔣經國領導下革新保臺路線之設想，即是加強政府與青年的聯繫，以進行政府的革新，⁴²也與這一路線的兩面性可以相通。此外，在政府方面，也有類似的兩面性，國安局批示便說：「警總解除運用關係，但應對王曉波仍予實施掌握考核。」⁴³既嘗試利用以控制其影響力，也時時加以監控。⁴⁴

綜合上述材料分析，儘管教育部（或說五人小組）有意整頓臺大哲學系，但是，孫氏接任系主任則為人事上的偶然，其執行方向也顯得超出教育部方面的預期。這解釋了過去研究者已注意到的疑點：如果孫氏是被派來整頓哲學系的情治體系人馬，為什麼一開始趙天儀解任後，校方先詢問何秀煌（何並且是殷海光派）

³⁹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1973年9月7日），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原始公文號：(63) 敬(春) 236964。9月12日批示。

⁴⁰ 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3年9月27日），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原始公文號：62 2893。

⁴¹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1973年9月14日），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原始公文號：(62) 敬(春) 237680。

⁴² 見王曉波，〈再論青年與政治〉，〈當前青年思想狀況與解決之道〉兩文（1973年3月）。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

⁴³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1973年9月14日），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原始公文號：(62) 敬(春) 237680。1973年9月25日批示。

⁴⁴ 此處尚可補充此兩面性。戒嚴體制下所謂「運用關係」，除了積極成為政府線民，顯然也有人基於打開活動空間的意圖而虛實配合，無法單以這四個字判定檔案中個別人物的作為。王曉波卷宗裡，一則後續監控報告中，便也提到當天與王曉波聊天的《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為「保安處運用人員」，但無進一步個人卷宗資料，缺少確實與情治單位互動的檔案資料，則只能先行保留，未能據以判斷。該監控報告見：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5.3.13），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無原始公文號，國安局檔案「王曉波」卷宗，編頁 77-83。

接任，由於何沒有意願，才輾轉由成中英推薦孫回臺灣客座接任？⁴⁵

在此，可以先作一個合理的推測：孫氏回到臺灣之初，教育部與臺大方面都向他表示希望整頓哲學系。但是這時教育部與臺大的期望，主要在處理陳、王兩人問題，並且主要是在教育部-校務體系內處理。因此，與情治體系之聯繫，主要在情資分享，尚未有以政治案件形式介入的意圖。由於孫氏個人因素，以及到任後與系上人事不合，才主動聯繫調查局，成為其線民，並不斷試圖將案情往中共統戰方向擴大。

此外，關於孫氏超出教育部預期，包括與調查局聯繫的許多行事，更可能屬於個人意圖，受害者李日章有一段關於調查局的陳述，也可與此相參照。事件發生後，李從文學院代院長李邁先口中，打聽到不續聘原因為安全方面有問題。透過親戚關係，李與調查局文教組負責臺大的人員面談，該員表示，從來沒有接過李的報告，亦即在調查局部份，沒有任何李的安全資料。⁴⁶與調查局、國安局檔案對照，目前所見，特別監控的對象，包括事件後續監控，只有王曉波、孟祥柯、成中英與趙天儀幾位。哲學系其他牽連教員，除了孫氏呈交資料，並沒有特別佈線。這條材料也從側面說明，孫氏多次表示誰的資料在安全單位都已查明等等，並不能說明調查局主動介入，反而，這很有可能是孫氏狐假虎威，借用與調查局這條曖昧的關係，以造成校方與系方心理壓力，達成個人的意圖。

2. 孫智燊與馮滬祥、心廬的關係：〈緊急座談會記要〉的傳發過程

繼續考慮另一條線：與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王昇關係密切，政戰體系的心廬。孫是否與之有所聯繫？王昇對臺大哲學系一直關切，並有意介入。臺大總教官張德溥回憶指出，哲學系事件之前，王昇便曾對他說：「臺灣思想的混亂，臺大哲學系要負一點責任」。⁴⁷由於馮滬祥為心廬一員，⁴⁸加上事件中孫馮二人

⁴⁵ 游欣璇，〈臺大哲學系事件之研究〉，頁 64。

⁴⁶ 見李日章在監察院調查報告中的陳述。並見李日章，〈不要以政治誣陷迫害學人〉，趙天儀編著，《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臺北：花孩兒，1979），頁 110。

⁴⁷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附冊，〈張德溥的談話〉（1993年10月9日），頁 Ya-3。

⁴⁸ 如張德溥訪談提及他聽聞馮與心廬聯繫很密切。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附冊，〈張德溥的談話〉，頁 Ya-2。馮自身說法則是，在1973年初陳、王被警總約談時，他並非心廬成員，之後他才為心廬撰稿。他藉此否認自己、心廬與哲學系事件有關，將責

關係極為密切，先前調查/研究多以此認為孫氏與心廬有所聯繫。後續〈自立晚報〉、《新知識》雜誌對〈緊急座談會記要〉刊布，主事者也多帶有心廬色彩。而一直接的證據便是，1973年6月，馮滬祥理則學零分事件中，馮威脅楊樹同哲學系「整飭在即」，顯示出馮對孫將要整頓哲學系的消息，已經有所知悉。⁴⁹

在這方面，國安局檔案有一條重要的材料，教育部人二室明確指出1974年4月孫智燊、馮滬祥所散發〈臺大哲學系緊急座談會記要〉，是在「心廬」油印：

孫智燊該兩次發表的言論，經馮滬祥整理為「臺大人文學科座談會記要」，「臺大哲學系緊急座談會記要」，並在「心廬」（文化大廈）打字油印約八十餘份分送各單位。⁵⁰

雖只出現一次，但由於正是本案由校園轉向公諸媒體之關鍵，因此「心廬」方面的介入，十分確鑿。不過，結合調查局檔案分析，其間可能有更複雜面貌，這條材料只能說明，在1974年4月之前，心廬方面已與孫有所接觸，但並不能直接斷言孫氏為心廬人馬，並論證整個案件為心廬方面所發動。

第一、假定孫氏一開始已有心廬背景，那麼他應可直接利用政戰體系與臺大校園教官，以推動整頓哲學系，但是卻繞路主動去搭上調查局的線，似屬多餘。又，從1973年9月到1974年3月〈緊急座談會〉召開，這段期間，孫氏不當顯得如此無能為力，蹉跎半年執行任務的時間。第二、檔案中，調查局對於其他情治單位業務上的衝突頗為小心，但從檔案所見，調查局對孫的監控並沒有發現他與心廬的關係。⁵¹第三、那麼，是否有這種可能：雖然孫為心廬人馬，但由於涉及國民黨黨內派系之爭，不便直接由政戰體系出手，引起蔣經國之疑慮，因此，孫氏隱藏心廬身份，而繞路聯繫調查局？從〈緊急座談會記要〉的傳發過程與後

任推與孫智燊個人。但他的否認，是將哲學系事件範圍限縮於1973年初的第一階段。即使其說法為真，在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上半年，哲學系事件第二階段，對照其說，亦不否認此時他與心廬有所聯繫。見馮滬祥，〈追憶經國總統與王昇將軍〉，《傳記文學》，90卷4期（2007年4月）。

⁴⁹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28。

⁵⁰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年4月17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敬(春)215130。

⁵¹ 例如，對於孫氏造訪調查局說明哲學系近況，高明輝擬定回應有一條是「王曉波孟祥柯兩人之最近言行，擬彙報大局，副本抄送警總參考。」沈之岳則批示「王曉波既由警總運用，吾人應尊重警總意見，不必提出異議餘如擬。」調查局，〈主旨：臺大哲學系主任來局晉謁局長〉（1973年9月7日）。

續媒體運作，目前可以判斷，這種可能性很低，反而，孫與馮之間雖然是合作關係，但孫的運作與心廬體系的運作並不一致。以下進行說明。

根據調查局檔案，調查局內部線報〈記要〉傳發過程如下：

孫主任會後將現場錄音整理成臺大哲學系緊急座談會記要，分送知青黨部，警總及本局。並於四月六日將該記要打向有關人士散發。其中二十份送交立委李文齋，由李委員在院會時發交各委員閱讀，並在四月九日蔣院長蒞臨立院時送交蔣院長，孫智燊並表示，「在李委員將座談會記要呈送蔣院長同時將找一人（渠本人不出面）到立法院請願，促使立院召開教育委員會徹查臺大哲學系內情，如此雙管齊下，目的是迫使決策單位擺脫人情下令交執行單位徹底查辦，現調查局，警備總部已掌握充分證據，只要上面一聲令下，此案即可水落石出」⁵²

而後續調查局線民呈報孫氏言論，談及印發之事，則說：

臺大哲學系主任孫智燊四月卅日在辦公室談稱：這次將緊急座談會內容印發，由馮滄祥向立法院請願，主要目的是使上面重視此問題。並能作一徹底解決。請願書正本送立法院，現蔣部長對此事非常重視，並召見我（孫）答應對哲學系問題作徹底解決，故目的已達到，立法院的請願案可以撤回。

53

另外，國安局檔案中教育部人二室記錄為：

四月十一日下午四時許教育部蔣部長於部內接見臺大系主任孫智燊與研究生馮滄祥，據悉：部長……對孫主任稱有關「座談會記要」之散發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增加許多困擾，改組哲學系系務乃基於愛護心切，但現在將毛子水，沈剛伯，閻校長亦予以打擊，自立晚報亦撰文引述，則屬不

⁵² 調查局（調查局長沈之岳發國安局），〈呈報臺大哲學系主任孫智燊召開緊急座談會記要乙份〉（1974年4月16日），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235-0237。

⁵³ 調查局，〈續報臺大哲學系動態〉（1974年5月8日），調查局「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228。

當。……又據研判，孫智燊下學年將不再繼續擔任系主任職。⁵⁴

之後，《新知識》雜誌刊登，孫氏又去函更正：

原稿「臺大哲學系緊急座談會記要」非本人所撰，凡本人個人發言部份一概負責……，本人從無將講詞抄下打字油印送閱之事，亦未授意任何人去做，僅於友人處獲閱一份，據悉係經人整理後，供立法院及有當局參考之用。⁵⁵

從這四份材料，進行分析：

- (1) 3月28日緊急座談會後，孫先將〈記要〉給的單位是調查局、警總、知青黨部（=教育部）。在孫本身，雖然3月27日已經向趙天儀表示將為中英事去立法院接受質詢，⁵⁶但是，對於是否全面公開，似乎他仍有所猶豫，最後經過一週的時間，直到4月6日才進一步送到立法院，請李文齋主持。
- (2) 李文齋的背景是前中統特務人員，⁵⁷唯尚不能斷定是否有心廬關係。但可以推定的是，最先收到〈記要〉的調查局、警總、知青黨部（=教育部）三方，一開始並沒有打算將之公開、讓事情擴大。因而，孫氏有進一步於4月6日「將該記要打印向有關人士散發」並「送交立委」之舉。
- (3) 從4月30日線民對孫的偵控顯示，決定「向立法院請願」，有馮滬祥的影響和參與（孫和馮討論可能是在緊急座談會之前，但中間孫有所猶豫，最後發動是在4月6日）。而孫的目標是讓教育部長蔣彥士重視，認為蔣彥士召見後，已經可以撤回立法院請願。因此，後續〈自立晚報〉、《新知識》雜誌方面對閻振興特別是蔣彥士的猛烈攻擊，顯然不是孫的目標。
- (4) 與此同時，雖然孫氏意圖迫使上面注重此問題，但教育部反應之劇烈，後續王昇方面攻擊之延燒，似超出孫氏設想。因而他對外或言撤回，或作

⁵⁴ 調查局，〈致國安局，續報臺大哲學系改組情形（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年4月30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敬(春) 217537。

⁵⁵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32。

⁵⁶ 趙天儀，〈哲學系動盪期間記事〉，趙天儀編著，《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頁85。

⁵⁷ 李文齋的背景，見〈蕭振文先生訪問記錄〉，收入劉金獅等口述，《白色聲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第一輯》（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1）。

不實的撇清。

從上述分析可知，孫更偏向於在教育部體系裡面解決，建議並採取行動讓事態公開，則很可能是馮滄祥的影響。孫氏認為臺大校方不斷想要大事化小，跟「中央」的命令不合，因此想要促使蔣彥士「重視」。其目標，也在以教育部、黨部對臺大施加壓力。相對於孫，馮似乎則利用了這點。希望(1) 把事情擴大、公開，(2) 進一步打擊教育部與黨部，讓政戰體系力量主導教育領域之思想控制。因此，採取立法院請願，乃至請轉呈蔣經國本人。因此，在《新知識》雜誌上，才進一步把矛頭指向蔣彥士。

過去調查 / 研究，對於孫跟馮的關係，多不能完全斷定。一方面，基本上把他們看作一個立場，另一方面，則又隱約察覺到兩者有一點落差。⁵⁸而從調查局線報中〈記要〉流佈過程，可以對此做出較為清楚的分析。(1) 在目標（引起教育部重視 vs 打擊教育部-黨部）與手段（先給情治單位與黨部再送立法院與蔣經國 vs 刊登於報紙雜誌公開）上，孫與馮有很大不同。(2) 〈記要〉的流佈過程，起初主導的還是孫，而非臺大調查小組推測，由馮來操作。(3) 但是受馮影響向立法院請願後，〈記要〉公諸媒體，顯然後果並非孫氏所期望。無論是致函更正表示自己並非作者也沒有授意送閱，或是在辦公室表立法院請願案可以撤回，雖然說法不一，但都顯示孫氏並無意事件鬧出教育部體系之外，往更上層的攻擊發展。

此外，從教育部在 1974 年 9 月，由於〈記要〉公開，外界多方去函要求教育部整頓臺大，而編寫的內部文件〈臺大哲學系近況概述〉，也可相對照，作為一側面證據。就這份文件的生產過程與運用，目前尚無細節證據，是否作為五人

⁵⁸ 臺大調查小組對此用力甚深，深具啟發，但對於孫馮關係，則未有定論。調查小組注意到孫智燊在〈記要〉公開刊出後去函更正，強調「原稿『臺大哲學系緊急座談會記要』非本人所撰」，「凡本人個人發言部份一概負責」，但「本人從無將講詞抄下打字油印送閱之事，亦未授意任何人去做，僅於友人處獲閱一份，據悉係經人整理後，供立法院及有當局參考之用」，而進一步從〈記要〉的按語，《新知識》刊登時的補充，指出〈記要〉可能經過加工，出於三人之手。調查小組認為：「主控權似乎並不操在孫智燊之手，……是孫智燊所不敢得罪或抗議的對象，（孫氏）並且只有僅於友人處獲閱一份」的份。那麼整個『緊急座談會』是否就是由此一我們所未詳的『人』或機構所主控，而孫智燊只是配合？」「事情發展至此，國民黨的某方，利用孫智燊和馮滄祥等『內應』，製造『哲學系緊急座談會』的指控事件，意圖『整頓』甚至『改組』臺大的用心已經很明顯。」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 32、84。

小組呈報討論之用。但從教育部檔案，該文作為 1974 年 7-8 月間外界多次批評的回應，則大體可以確定。⁵⁹該文內容仍支持孫的說法，指出要「清除思想不純教學欠當教員……另增聘國內外優秀教師……加強中國哲學課程，端正學術思想……阻遏逆流，強化主流。」但是卻特別指出事件公開的問題，將之指向馮滬祥：

上述事件發生後……本部鑒於哲學系近年來所顯露之種種不正常現象有日漸嚴重之傾向，乃決定協助校方進行改組。六十二年留美學人孫智燊應國科會邀請回國擔任客座副教授，經本部與臺大洽商聘為該校哲學系代主任，著手系務與人事整頓之進行。……孫主任接事之初，發現該系內有代系主任趙天儀把持系務，結合私人，排斥異己，外有在美研究之前系主任成中英言論偏差，為匪張目。乃……召開系內師生座談會，會中根據事實提出檢討。惟事後因座談會內容被研究生馮滬祥擅自以「臺大哲學系緊急座談會記要」對外發表，以致引起外界普遍關注。⁶⁰

就此，也可以見到孫馮二人並非一條線。從教育部、知青黨部的立場，在事情鬧大，教育部受到輿論攻擊下，或有考量，迴避起用孫之責任，而仍然支持孫，但事情之擴大，主要是對馮頗有微詞，沒有將孫視為心廬方面的人。

因此，一個合理的推測是，孫在明，馮在暗，馮知道孫的使命（在教育部、黨部授意下，整頓哲學系），而孫則不完全知道馮的背景（王昇-心廬體系），只認為馮是「愛國愛黨學生」，兩者之間為不同的線。孫並非心廬成員，只是其一意孤行，給了馮介入的絕好機會，而衍生案（整頓哲學系的赤色指控）外之案（心廬體系對教育部-黨部的攻擊）。

這一推測，也符合趙天儀回憶座談會原貌：孫回答馮的發言「如果是我孫某人來打分數，也是不及格。馮滬祥我告訴你，你告錯了地方。」⁶¹孫並不特別

⁵⁹ 該文件與隔月調查局所編〈臺大哲學系調查節略〉，多次文句重複相近，或可推測，教育部編寫過程，有調查局人員協助，又或經五人小組的橫向聯繫。「監察委員即將前來本局巡察，可能詢及本案，謹將本案調查節略乙份呈請參考」調查局，〈臺大哲學系調查節略〉（1974 年 10 月 23 日），調查局「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084-88。

⁶⁰ 教育部編，〈臺大哲學系近況概述〉（1974 年 9 月），調查局「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142。

⁶¹ 趙天儀編著，《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頁 63。林正弘教授也在訪談中回憶，緊急座談會上，

厚愛於馮，也未顯示出同一陣線。此外，最後孫氏回美國前夕，提出推薦聘任名單，上面學者多數與心廬有關，但是孫氏意外地讓全系教師參與投票，而非逕自決定，導致只有一位通過。也顯示出，孫與心廬有一種合作、聯繫的關係，卻非完全積極配合。⁶²

惟就目前檔案材料，尚無法斷定，在〈記要〉公開之後，孫在什麼程度上了解到馮的校外政治背景，特別是1974年7月《新知識》雜誌連續評論哲學系事件，將砲口指向閻振興、蔣彥士之際，孫是否察覺到馮的心廬身份與操作？

3. 王昇與李煥之爭：調查局對香港雜誌《七十年代》剪報的批註

以上，除了釐清孫智燊與教育部，以及調查局、心廬（政戰）方面的關係，調查局檔案中還有一份剪報批註，透露了不少相關訊息。當時據說接受中共資助，抱持左派立場，頗為敢言的香港雜誌《七十年代》，在1974年10月刊出〈臺大哲學系的風波〉一文，指出哲學系事件中，發展至此，乃是因為涉及國民黨內部的王昇與李煥之爭，批評王昇試圖藉此案擴大勢力。關於這點，過去研究多已注意，如臺大調查報告認為可能涉及黨內鬥爭。但由於缺乏其雜誌立場，並不能作為一手材料判斷其所述的真實性。對此，調查局在該文剪報的評註，卻反過來佐證其部份的可信度：

香港左傾刊物七十年代以「臺大哲學系的風波」為題報導臺大近一年來哲學系所發生諸事件，其中許多故意歪曲事實，挑撥離間打擊我民心士氣，而該文對整個事件的發展及許多極機密內幕消息均瞭若指掌，其消息之來源頗似高層內幕人士所提供。中華雜誌編輯侯立朝稱：「這篇文章是共匪所運用的統戰陰謀，寫得非常技巧，第一段在挑撥王昇與李煥，第二段將臺大哲學系糾紛演飾為方東美與殷海光的學派鬥爭，以遂其分化臺大之陰

當時可以看出孫馮關係已經不好，孫的話讓馮很沒面子：「現在有國家大事要談，你個人的事先不要講，而且你那份考卷我看過，就是我來評分，你也不會及格。」林正弘訪談，促轉會諮詢會議記錄（2020年2月18日）。

⁶² 「孫智燊離開前，因為系上已經解聘一批人了、有空缺，需要新聘教師。孫智燊便提出一份推薦聘任名單，並請大家投票同意。這件事很稀奇，因為過去孫智燊什麼事情都不願意和我們談，這次居然要投票。我想，可能是名單太難看，孫自己都不想背書，於是用投票的方式向交代他的人『交待』。這份名單中都是心廬相關的人——許遜、馮滬詳、張肇祺、黎東方、劉孚坤……。其中，只有劉文潭投票通過，只聘他一人。」林正弘訪談，促轉會諮詢會議記錄。

謀。第三段歪曲事實，栽贓於孫智燊，使政府對孫失去信任。」隨文謹呈七十年代影本一份。⁶³

調查局評註一方面指稱該文「歪曲事實、挑撥離間」，另一方面卻也指出「該文對整個事件的發展及許多極機密內幕消息均瞭若指掌，其消息之來源頗似高層內幕人士所提供」，值得分析。亦即，《七十年代》儘管意在歪曲挑撥，但卻事有所本，並非空穴來風。那麼是誰提供了香港記者內幕消息？儘管無法判斷，提供消息的「高層內幕人士」是否是李煥（時任國民黨組工會主委、救國團主任）方面，以媒體戰對抗媒體戰。但李煥王昇之爭在哲學系事件中的因素，顯然為調查局內部人員所知悉。該文主要批評王昇試圖藉此案擴大勢力，這一批註反而印證了該文指出的王昇與李煥之爭。

4. 蔣經國的角色

先前，由於材料所限，蔣經國在哲學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模糊。可以看到的，只有事件告終，1974年9月孫智燊返美前，接受蔣召見加以嘉勉。此外，在事件前，他便對臺大校園的思想狀況頗為注意。而作為威權體制負責人，其責任亦是明顯的。但是，具體上他到底做了什麼指示？介入到什麼程度？儘管材料仍不完整，但是國安局檔案中，國安局長向局內部屬轉達146-148次永靖會議中主席指示，是一重要的新材料（按，公文本身並無出現「蔣經國」名字，但從「主席」稱謂前空一格表尊敬推論，主席應為蔣經國）。其大致指示分別為：

1974年3月4日，146次：詢問是否有哲學系調查資料。⁶⁴

1974年4月9日，147次：必須嚴加辦理。⁶⁵

1974年5月3日，148次：希望留任孫智燊。⁶⁶

⁶³ 「據本處文教組工作關係陳天鷹報稱……」調查局，〈無標題〉（1974年10月23日），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117-0119。原始公文號：（68）動字第6521號。

⁶⁴ 「轉達 主席指示事項臺大哲學系主任問題有無擬各單位情報之先？」擬遵示協調遵辦 3.4第146次會議 主席指示」周中峰（國安局長），〈批示〉（1974年3月11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泰祥字第0942號。

⁶⁵ 周中峰，〈致國安局第三處，轉達永靖會議主席指示事項〉（1974年4月16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泰祥字第1547號。

⁶⁶ 永靖會議148次記錄並未收入國安局檔案卷宗，在一篇線報後有鉛筆批示談到「主席指示」，推測應該是國安局長批示。線民羅定國，〈致石英華，談香港自由報報導〉（1974年5月11日，

三次會議中，蔣經國雖無直接明確指示如何辦理，但其態度則影響了哲學系事件的走向。下面在案情分析與責任歸屬中，將進一步加以討論。

三、從目前檔案材料推估的案情輪廓：三個不同層次案件的交錯

根據兩局檔案新線索，以及前一節分析，目前可以對哲學系事件做出一個新的評估。

哲學系事件並非單一政治案件，而是三個不同層次的案件的交錯，因此顯得不易掌握其「外力介入」或「加害體系」；但也因此，本次予以初步釐清後，這些不同層次的交錯，亦使得這個判刑程度不大(最後均未涉及軍法審判)的案件，特別能體現出戒嚴時期威權體制治理的特徵與其在 1970 年代初期的變化。

1. 第一個案件：警總約談陳鼓應、王曉波

事件中的第一個案件，是陳鼓應、王曉波（也包括孟祥柯）等人，在保釣後續校園民族主義運動中，批判言論超出國民黨政府的容許，而導致警總的介入審訊。應該是在這時成立的「五人小組」（成立時間尚無明確資料），以「中央」的角度，試圖以非「政治案件」的方式，在臺大校園裡面解決問題。因而由臺大校長閻振興出面保釋，並執行後續不續聘與轉介他職。第一個案件的經過與細節，相對清楚，過去的調查/研究也比較完整，此處不再贅述。

但是，這種政治力介入，儘管從黨國角度看已經是「溫和」⁶⁷，在臺大校內觀點卻非如此，激起哲學系內部的反對。民族主義座談會與理則學零分事件，當時代系主任趙天儀均認為不合規定，未與校方配合，也因此，處理不符校方期待而遭解職。此外，臺大哲學系長期有殷海光系與方東美系之爭，思想主張的歧異、人事的糾葛，更容易形成反對聲浪。最後輾轉由成中英推薦，在歷史偶然下，由孫智燊回臺灣擔任系主任。哲學系從殷海光以來，便被視為容易出事的監控重點，

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策略字第 0714 號。

⁶⁷ 見高明輝對孫氏提及五人小組的回應與回憶，「有關前臺大哲學系主任孫智燊提及，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曾下令……組五人小組，溫和處理全案，高明輝說，蔣經國對學生一向寬大，他相信蔣經國會做出如此指示，所以當時被監控的教授們，無一受到軍法叛亂罪的審判。」高明輝訪問，《聯合晚報》，1995 年 6 月 25 日。

孫回國之初，便由教育部方面得到指示，加以整頓。

2. 第二個案件：偶然到任的孫智燊將哲學系編織進國際性赤色陰謀

這便導向第二個案件，這也就是一般認為的哲學系事件重心。孫智燊任系主任後，以「中央」指示之名義，獨斷獨行，編織中共統戰陰謀論，意圖大幅改動系務。就目前所見檔案材料，他的編織攻擊，超出教育部長蔣彥士與臺大校長閻振興的期待。因此閻振興一度凍結哲學系人事案達半年之久。⁶⁸教育部方面，期望較為漸進地變革，國安局方面，關注也更在於王曉波在學生運動的影響力，在1973年9月，對於其陰謀論檢舉並未重視。但孫氏本人仍然積極於其國際性赤色陰謀的幻想，最終在隔年3月發動〈緊急座談會〉，牽連所及，造成多位教員不續聘。

根據兩局檔案判斷，孫氏並無調查局、與政戰體系心廬方面背景，只是主動向調查局檢舉並擔任線民，並與（很可能）有心廬背景的研究所學生馮滬祥密切往來。第二個案件中，主要的發動者當是孫氏本人，同時，其想法也受到馮滬祥的影響。

孫氏為何執著於此？這裡可以注意兩個層次。

(1) 孫氏本身的心理特質與人事構想：

(a) 從各方記述，孫氏有相當程度的心理偏執，⁶⁹並且與愛國／反共／恐共意識連結。⁷⁰

⁶⁸ 經過1973年8月與哲學系上多名教員衝突，引發九位教員聯名提告校長閻振興，閻於1973年9月11日指示哲學系人事凍結。趙天儀編著，《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頁84。

⁶⁹ 例如，臺大文學院代院長李邁先「去立法院澄清有關哲學系謠言，大意說孫某神經有問題，請不要相信他的話」，又告知趙天儀說，「我是學歷史的，孫的那對眼睛，我實在不想看，就像希特拉（希特勒）！」（1974年4月中旬）閻振興與趙天儀對話時，說：「成中英真該死，怎麼推薦這種人來任教！」（1974年4月10日）臺大教務長魏火曜則說「這個人如果不是神經有問題，就是共產黨！」（1974年6月）見趙天儀〈哲學系動盪期間記事〉，趙天儀編著，《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頁87-89。雖為趙天儀所記，但是不同人都有類似觀點，孫氏心理偏執之說，當為可信。

⁷⁰ 王曉波說在1995年會面時，孫氏仍表示受牽連者，雖然當時可能不是赤色份子，但很有這個傾向與可能。見王曉波在監察院調查時陳述。游祥洲教授，與孫氏一度往來較多，後也被孫氏列入不續聘名單。他則觀察，孫是個「唐吉訶德式的人」。游認為這種個性與「愛國的狂熱主義」，適與馮滬祥的「反共」心態相呼應而加強，「彷彿『我終於找到對手了』、『我終於可以表現我是

(b) 與此同時，這種偏執，又與他對哲學與臺大哲學系人事的觀點相連。在 1974 年 8 月 31 日給調查局的檢舉資料中，他從自身視角，詳述哲學系自殷海光主持以來「任用私人」、「排斥正派」的經過，並指出方東美系多被打壓。這進一步使他將人事派系之爭，進展到中共統戰的陰謀，並將傾向自由主義、西方哲學的殷海光系視為反政府份子的統戰基地。而期望改組哲學系人事，以方東美、唐君毅等偏重中國傳統思想的教授代之。⁷¹

(c) 此外，在他自認的方東美一系傳承中，由於目前仍不知的原因，孫對提拔他的成中英，抱有很深的不滿。⁷²

(2) 教育部-黨部指示不明確：

孫氏多次抱怨系上乃至校方都不支持教育部要他執行的任務，而未曾注意到，其本身任務執行，超出了中央-教育部之期望。這顯然來自教育部指示並不明確，是支持孫，還是叫停孫的改革？這一模糊立場，最終導致孫的失控。

如第二節所分析，在 1974 年 9 月，對於 8 月孫氏與系上教師的糾紛，蔣彥士、孔服農與孫會談，希望他「以靜制動，無為而治，使主流增長，逆流衰退，不再大事改革」。既希望加強控制，又希望穩健為主，這一立場，大約保持到 1974 年 3 月。其間，孫不斷尋找各種可能舉發陰謀的「證據」，但都未為教育部、青工會、國安局認可，但也沒有撤除其「改革」任務。如他舉發成中英接受哈佛

個愛國學人」。游祥洲訪談，促轉會諮詢會議記錄（2020 年 3 月 16 日）。

⁷¹ 調查局，〈主旨：臺大哲學系主任來局晉謁局長，附件：孫智燊檢舉備忘錄〉（1974 年 8 月 24 日），調查局「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檔號：0338-370。此外，臺大哲學系兩派之爭，在孫回國之前，內部已經有所延燒，另一派人士的看法，可能也影響、加強了孫氏的偏執。見 1972 年哲學系「一到三人」、「某副教授」匿名向立委監委指控當時系主任成中英，只重視邏輯哲學輕視中國傳統思想的事件。見〈成中英自辯誣〉、〈林正弘辯誣〉，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附冊》，頁 101-111。（匿名教員是誰目前資料不詳）

⁷² 儘管成中英在美國攻讀博士時，師從 Willard Van Orman Quine，專攻邏輯，但方東美門下並未因此將成視為西方哲學派。此一偏執，似為孫氏個人想法，而非方東美門下的一般看法。因此，孫氏編織成中英的赤色份子罪狀，個人恩怨在其中的可能較大。方東美門下看法，可參考調查局檢閱劉述先致方東美函：「臺大哲學系主任，中英交由智燊暫代一年，兩人同出師門，智燊且為中英所邀回台，各事順遂可料，詎知大謬不然，事情竟發展如斯。後聞中英被扣上紅帽子，於收到緊急座談會紀錄後，證實係智燊所為，我們不容許這種飛紅帽的事。」，調查局，〈檢送劉述先寄方東美函影本乙份〉（1974 年 6 月 10 日），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338-370。此外，游祥洲訪談中亦提到，「當孫先生不斷把成先生描紅的時候，方先生聽到就很生氣。」游祥洲訪談，促轉會諮詢會議記錄。惟林正弘教授回憶則有不同，指出在歡送孫氏返美餐會上，「我親眼看到方東美舉杯向孫致敬，說『整頓哲學系成功』。」不過，其回憶也指出，成中英並未對方氏有所怨言，亦不認為方氏支持孫氏。見林正弘訪談，促轉會諮詢會議記錄（2020.2.18）。

大學燕京學社補助，指為費正清集團之收買，國安局卻回應這並非事實：

燕京學社……若干經費由中央研究院處理，並交李亦園許倬雲負責辦理，曾獲故胡院長之同意，思與言社之成立與此款關係極大。成中英為思與言社份子之一，……故事實與孫主任臆斷當有距離。⁷³

後續，孫氏繼續舉報成中英「提語言分析，走向價值中立說，否定價值，否定倫理，更加否定傳統，否定文化，造成思想汙染之原因」，「在臺期間，玩弄女生」，並指趙天儀「代辦成中英與女生墮胎之事，故以此把柄百般威脅」。⁷⁴又對燕京社獎助金接受人提名案，指責李邁先、顏元叔等人「沆瀣一氣，內定人選」支持趙天儀，認為燕京社為美國費正清集團一手操縱。⁷⁵這些舉報，可視為隔年3月陰謀論的雛型，教育部也都沒有重視回應。在這段期間，1973年9月、1974年1月，孫氏兩度提出請辭，又為教育部挽留。⁷⁶正顯示出教育部既希望孫氏整頓，又不希望他過度發揮的立場。

但是，這一立場原本即不穩定。當孫智燊的心理偏執，與黨國威權體制運轉齒輪的卡頓相遇，巨大的國際性赤色陰謀也就越發超現實地被編織出來。在此風雨前寧靜中，孫氏在自己主觀想像上，不斷把其受挫等同於反對陰謀之存在，而執著於將案情上報，最終，從批評文學院學閥開始，進而批評校方，進而立法院請願……。

1974年3月，兩件事情破壞了這一不穩定的寧靜。首先是3月4日，146次永靖會議中主席（蔣經國）詢問哲學系改革案的情報狀況。⁷⁷其次是孫智燊於

⁷³ 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3年10月4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第三處(62)2943。

⁷⁴ 調查局，〈本案除續飭本局臺北處注偵趙天儀，王曉波等人言行，偵蒐該等涉嫌事證外，檢呈臺大哲學系系主任孫提供之「臺大哲學系內情詳案」資料複印本乙份〉（1973年10月20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2)自(二)。

⁷⁵ 調查局，〈情報報告(通報)〉（1973年12月17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2)莊字第054241號。

⁷⁶ 「孫主任於1月8日表示，擬請辭兼代系主任職務，現已由本處疏導暫時打消原意。」調查局，〈致國安局，續報臺大哲學系改組情形(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年1月18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敬(春)202076。

⁷⁷ 「轉達 主席指示事項臺大哲學系主任問題有無擬各單位情報之先？」「擬遵示協調遵辦 3月4日第146次會議 主席指示」周中峰（國安局長），〈批示〉（1974年3月11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泰祥字第0942號。

3月28日召開哲學系緊急座談會，宣稱成中英為毛澤東思想張目，指控赤色陰謀。

孫氏發現（實際上是誤讀加上編造）成中英在美國發行的《中國哲學研究》上，轉載了中共的哲學文章。雖然該書不過是資料性收集刊物，孫卻如獲至寶，將成中英的幾句引言按語，看作是成氏通匪的證據。先前，孫氏已將成中英問題呈交調查局，而被要求偵查期間不要對外發表。⁷⁸但他對此似乎有意造成校園裡的緊張氣氛，在1974年3月20日臺大大學論壇社座談會上發表，繼之在3月27日告知趙天儀表示成中英為匪宣傳，並於隔日召開緊急座談會，展開對赤色陰謀的揭發。再於4月9日將紀錄公開散發，並由立委李文齋呈交蔣經國。結果，4月9日調查局將〈臺大文學院哲學系內情簡析〉（完稿於3月23日，內容可見到多根據孫智彞線報，充滿偏差）提報147次永靖會議，對此，主席指示：

本案至為重要，請（國民黨）組工會密切協調，積極有效予以整頓，斷不容其繼續惡化，成為毒素思想散播之溫床。⁷⁹

與此同時，心廬方面也配合〈記要〉公開，展開了輿論上的攻擊作戰。

3. 第三個案件：王昇心廬體系藉機攻擊閻振興、蔣彥士、李煥

在黨國各方都派有人馬的臺大校園，⁸⁰教育部-黨部處理上進退不定，便給了心廬方面很大的空間，製造了第三個案件。馮滬祥以孫氏眼中愛國學生的角色，在召開緊急座談會之際（無法確認座談會是誰的主意），提出向立法院請願（很可能受到馮的影響），順勢將孫的偏執，導向公開案情的方向。使得哲學系事件與心廬方面產生連結。此後，與心廬體系關係密切的《自立晚報》副刊史紫忱之報導、《新知識》雜誌之刊登全文並另外作文攻擊臺大校長閻振興乃至教育部長

⁷⁸ 調查局，〈臺大大學論壇社舉辦座談會情形〉（1974年3月21日），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264-0268。

⁷⁹ 周中峰，〈致國安局第三處，轉達永靖會議主席指示事項〉（1974年4月16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泰祥字第1547號。

⁸⁰ 見張德溥對保釣運動期間臺大校園的觀察，張當時為臺大總教官兼任訓導長，哲學系事件發生時已經調職。談到保釣運動過後的代聯會主席選舉，張回憶「後來有學生偷偷地告訴我，他（當選的王復蘇）是王昇勢力滲入校園的代表，目的是與李煥爭奪校園的黨權。」張德溥口述，洪三雄採訪，鄭鴻生整理，〈折戟沉沙（下）——張德溥在臺大軍訓總教官歲月的回憶節錄〉，《傳記文學》，80卷1期（2002年1月）。

蔣彥士。這些行動，與馮公開案情有因果上的關聯，也顯然有內部組織上的聯繫。第三個案件的攻擊方為王昇體系，被攻擊方則是臺大校長閻振興，教育部、黨部的蔣彥士，乃至處在背後的李煥。心廬方面在公開媒體上，以赤色份子定調臺大哲學系，引起各界議論紛紛。直到 1974 年 9 月 15 日孫氏離職返美後，輿論仍繼續延燒。⁸¹

第三個案件的效應，可以分為兩部份。

(1) 在哲學系，輿論造成教育部與臺大的壓力。雖然孫氏也流露出「公開」並非他的本意，而有「可撤回請願」之言談，但就結果看，這顯然鬆動、突破了孫氏半年多來處處碰壁的困境，而成功地達成他對多位教員的不續聘案。儘管 1974 年 6 月 17 日提出，繞過文學院直接送達臺大人事室的作法，被退回重跑程序，但最後仍在 6 月 25 日由閻振興在行政會議上通過。4 月 10 日閻振興與趙天儀談話，對孫氏相當不滿，並指孫當時已是「困獸之鬥」。⁸²與此比較，可以看到 6 月校方決定，當是外界壓力致使閻氏接受孫氏的提案。⁸³

(2) 另一方面，其主要目標則在臺大校園之外。在 7 月，當臺大哲學系系務問題以孫氏勝利告一段落，《新知識》雜誌在此時首次刊出〈記要〉全文，發行人陳征遠並強調：

中央有同志對我說，臺大哲學系內部自孫智燊在緊急座談會中提出的問題，均分別處理了，何必再將「座談會記錄」刊出呢？⁸⁴

顯然，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儘管就目前檔案材料仍無法確知，王昇與李煥個

⁸¹ 從 1974 年 7-8 月起，由於該案公開，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會、國大賈國恩等均致函教育部要求徹查。10 月，監察院亦聯繫表示將造訪調查局了解案情。《七十年代》與各海外報刊之報導評論，也都主要在 10 月刊載。

⁸² 趙天儀編著，《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頁 89。

⁸³ 臺大調查小組細緻地分析了 1974 年 6 月 27 日校務會議上，閻振興回應各教師與系務主管之質疑，認為其說明「避重就輕，而且還捏造事實」，這是很明確的。見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112-117。但是，如果不只看 1974 年 6 月最後對解聘案之通過，而考慮 1973 年 9 月之凍結人事半年，閻氏顯然並非一開始便全力配合孫氏，甚至從孫氏來看是非常不配合，這其中的變化，顯然受到「記要」公開後外界壓力的影響。

⁸⁴ 陳征遠，〈我必得要說的幾句話——為本刊刊登「臺大哲學系緊急座談會記錄」再向文友交待〉，《新知識》，第 85 期。轉引自：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 31。

人在事件中的想法與指示，但雙方相關人士的參與則可確定。可以說，第三個案件大體為王昇方面對李煥方面的攻擊。綜觀《新知識》前後各文內容與標題：「我要請教蔣部長和閻校長，二位先生對此事應作一合理的解釋！」、「閻振興校長……是政府一手提拔的，……毫無大事大非之心，為了保持現有的職位，……去巴結討好這些洋奴買辦的政客學閥，成了費正清集團在臺的御用工具。」、「執政黨應立即改組臺大」、「教育當局應接受教訓！」、「從臺大問題論執政黨的教育政策——請蔣彥士效法『包青天』」，⁸⁵《新知識》不斷要求整頓臺大哲學系，但層級則更往上更升高，清楚將矛頭指向閻振興與蔣彥士。顯見，這只是派系鬥爭的工具，而無關實際上哲學系內部的整頓了。

先前，臺大調查小組推測，閻氏接受孫氏提案，「閻校長對孫氏處置太過溫和……也許閻校長這時感受到威脅，閻校長怕的是孫背後的勢力，他最怕的是被攻擊為『對自由派太軟弱』！」⁸⁶而經過上述分析，可以加以補充修正的是：此處《新知識》所說，認為「問題已處理，何必再刊出」的「中央有同志」，指的當是教育部-黨部-臺大方面。他們希望盡快將孫氏這個燙手山芋處理完畢，以應對將要到來的王昇方面媒體攻擊。在這種狀況下，對教育部來說，不管是承認任用孫氏的錯誤，或是放任孫氏編織中共同路人陰謀（實際上並不可能真的照孫氏所指控而「破案」），都會造成弱點，便利王昇方面攻擊。因此，在不擴大國際性陰謀論延燒下，簡單迅速地處置不續聘案，顯然成為教育部與臺大的選項。校方一改去年9月凍結人事的以靜制動、無為而治方針，而因此牽連的無辜，似乎也因此不在考量。

這一時期，教育部的態度頗為奇特，充滿矛盾。由於不能承認，又不能放任，在公文上很難直接找到白紙黑字寫出「我們搞砸了」的證據。但由公文中矛盾之處，仍可對此加以說明。以下，透過國安局檔案幾則材料，從其矛盾的各個層次，試提出一比較可靠的推論：

(1) 教育部急於滅火。在1974年4-5月之間，對〈記要〉公開造成的混亂，教育部急於滅火。教育部緊急約談孫智燊、馮滄祥，並洽商受孫攻擊的文學院長

⁸⁵ 轉引自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75-85。

⁸⁶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126。

朱立民、外文系主任顏元叔（兩人均具有黨員黨職身份），「除婉言疏導外，並以問心無愧，泰然處之，加以勸解」，以避免他們公開回擊、事態擴大。⁸⁷閻振興也安撫並壓制趙天儀召開記者會。⁸⁸人二室並稱「又據研判，孫智燊下學年將不再繼續擔任系主任職。」⁸⁹

(2) 蔣經國卻根據調查局報告，指示對哲學系加強整治，5月3日永靖會議上，蔣經國指示希望留任孫智燊：

臺大閻校長如不能留任哲學系主任之請辭，則新主任人選必先報請中央青年工作會同意，始可任用。⁹⁰

(3) 校長「不得不」通過哲學系人事案。1974年5月30日，孫在辦公室稱：

哲學系人事將在今年暑假內作一徹底整頓，以清除多年積弊，此亦是上級之決定，閻校長不得不表贊同，並當面指示凡安全品德或能力有問題者均不予續聘，惟事先需與校長密商後決定。⁹¹

(4) 關於孫的續聘教育部奇特態度。

1974年5月12日，孫回覆應聘南阿拉巴馬州立大學教職，⁹²但又表現出很想留下卻無法留下的態度：

孫多次向學生聲明，將於8月回美執教，但私下曾表示，若哲學系需要他，

⁸⁷ 1974年5月14日，孔服農與朱立民談話。調查局，〈致國安局函（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年5月?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敬(春) 221244。朱、顏等本打算也公開筆戰，經過疏導後，決定改向中央各單位呈遞聲明。調查局，〈致國安局函（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年5月21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敬(春) 221605。

⁸⁸ 「……閻校長要我寫一份澄清書。他說：『成中英真該死，怎麼推薦這種人來任教！』又說如果我召開記者招待會，下學年度就不給我聘書。並強調孫某現在正在作困獸之鬥，叫我不要把事情講出去。」趙天儀編著，《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頁88-89。

⁸⁹ 調查局，〈致國安局，續報臺大哲學系改組情形（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年4月30日）。

⁹⁰ 永靖會議148次記錄並未收入安檔卷宗，在一篇線報後有鉛筆批示談到「主席指示」，推測應該是國安局長批示。線民羅定國，〈致石英華，談香港自由報報導〉（1974年5月11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策略字第0714號。

⁹¹ 調查局，〈情報報告通報，致國安局〉（1974年6月5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六三 莊字第051941號。

⁹² 孫智燊，〈備忘錄〉，轉引自：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119。

他願留下來繼續為該系服務。⁹³

而對於孫是否續聘，教育部聲稱積極促成留下但實在無法介入校務：

5月31日蔣部長曾稱，由於院長指示，我曾多次以個人之關切與閻校長研商，但因職責範圍，我不便干涉學校行政。

黨中央組織會主任李煥、青年工作會主任王唯農均曾就此問題與閻校長婉為說明，6月1日上午十時許，校長指示該校執行秘書，孫主任下學年續聘事，與葉維善秘書多聯繫，但臺大有關教員聘任全由各院自行提聘，校長難以干預，請孔秘書與葉秘書盡力促成。

據悉，有關哲學系主任聘任問題，全由文學院長朱立民決定，基於朱為本黨黨員，如北區知青黨部俞書記長與朱院長會商，可能對此問題或有助益。

94

孫氏記錄則顯示校長並未積極續聘他，1974年6月3日：

閻校長約談孫主任，閒談一個小時餘始終未談及留任孫主任事。⁹⁵

其間，則頗有各種傳言：

現哲學系盛傳，中央及黨認為孫主任放言無忌，將於下學期不予續聘，又馮滄祥曾告訴同學，若要孫主任繼續留任，必須寫信給校長予以挽留等語。

96

最後，8月1日臺大校長閻振興接見孫智燊：

孫員向校長表示不願續任系主任，並將聘書擬當面退回。閻校長告訴孫員，實在令人難過，而且在匆促之間，對系務及人事之安排，亦諸多不便。⁹⁷

⁹³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續報臺大哲學系改組案（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年6月10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敬(春) 223944。

⁹⁴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續報臺大哲學系改組案（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年6月10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敬(春) 223944。

⁹⁵ 轉引自：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119。

⁹⁶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續報臺大哲學系改組案（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年6月10日）。

⁹⁷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續報臺大哲學系改組案（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年8月9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敬(春) 233346。

8月2日，孫氏正式提去職簽呈：

孫主任就其去留問題，向閻校長提書面簽呈，以表明其去志之堅。⁹⁸

教育部-校方在1974年6月通過孫氏人事提案，造成哲學系事件。邏輯上，這有兩種可能。(a) 教育部相信孫的檢舉，只是行動上有瑕疵，仍然信任他。因此執行他的人事提案，並希望他留下來繼續當系主任。(b) 教育部已經知道孫的胡亂編織檢舉，但「別有原因」，不得不執行其提案，並表現出挽留之意，然而實際上並不給他支持，暗示他離開。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到 (b) 才能解釋教育部的奇特態度。正如孫氏在6月17日不續聘案中，將自己也寫進去：「本人雖非上智，猶不乏自知之明。……委以行政，則用非所長。觀其一年以來，系務改革無尺寸之功，凡所建議，不獲校院支持而致杆格難行，其明證也。」⁹⁹由這段話，可以清楚看到，孫氏提案雖然通過，但遠非與教育部合作愉快之局面。

「別有原因」為何？在〈記要〉公開後，兩方原因，使得教育部呈現出進退維谷的處境：(1) 蔣經國指示支持孫智燊，教育部-黨部卻又不能讓蔣經國發現自己搞出一團亂。(2) 心廬方面媒體正煽動輿論加強攻擊，教育部卻又不能公開反擊說明，一反擊則自己挖洞的錯誤就更明顯。如是，決定了臺大哲學系各教師的解聘命運。其結果是，既通過了孫氏提案，但受到「威脅」的校方-教育部，亦不完全買單孫氏，而設下停損點。既向蔣經國交待完成任務，也防禦王昇方面的繼續攻擊。最終，孫智燊出國前一天，受蔣經國召見，嘉勉有加，教育部的兩難也告一段落。

4. 案件的突然中止

三個案件的分析，如上述說明。還有一點需要討論：過去調查/研究沒有討論到，哲學系事件為何突然中斷/結束？王昇方面雖然轟轟烈烈開展攻擊，但哲學系事件也基本按照教育部-校方設下的停損點停止。大約到了1974年底，該事件似已在媒體上沈寂。臺大調查小組認為，王昇已經在此事件中獲取優勢，隔年

⁹⁸ 孫智燊，〈備忘錄〉，轉引自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119。

⁹⁹ 轉引自：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109。

即升任總政戰部主任。¹⁰⁰但是，閻振興仍然繼續擔任臺大校長（至 1981 年），蔣彥士繼續擔任教育部長（至 1977 年）、李煥直到 1977 年才因為中壢事件失勢。從這方面，似無法說明王昇體系的勝利與砲火的止息。

目前沒有檔案材料說明砲火停止的原因，不過，一個可能性似乎是，王昇方面也發現孫智燊所編織的國際性赤色陰謀，語多荒謬，因此追打不下去。此處，紐約華埠的中文報紙《星島日報》於 1974 年 10 月的報導可以作一側面參照。由於當時臺灣媒體受到管制，過去研究者很少注意本事件的輿論反應（除了心廬體系的操作），而檔案局所藏，當時行政院新聞局駐紐約新聞處檢送的海外報導，由於不受管制，提供了這方面的消息。就其內容，有些是一般性的評論，如對學術自主的聲援，或對赤色份子的批評，但也有的海外撰稿者，消息相當靈通，《星島日報》這篇報導，不少受訪從內容判斷，可以看出是臺北的一手採訪，只是以匿名呈現。¹⁰¹

其中，超出單純地批判中共統戰或聲援學術自主，受訪者特別關注的是，國民黨在本事件中的表現，頗令人費解，如以下幾段：

孫的談話有很多矛盾，譬如口口聲聲說不是國民黨員，又反覆提到中央要整頓哲學系，國民黨看了，自己有什麼感想。最費解的是，國民黨到現在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反而讓這篇開會紀錄到處發表，不知是什麼用心。

我想國民黨可能，但也不一定授意清理。也不會期望事情清理得這麼嚴重。國民黨為求政治上太平無事，自然覺得王曉波這般人煽動性大，說話不負責任，能名正言順解聘，給他們換個差事。會錯了意，不知分寸的大搞起來。鬧得臺大校園紅帽子滿天飛，想來國民黨也一定很窘，所以不知道是不吭聲好，還是公開說話好。要知道孫到底是歸國學人，挾公仇報私怨也說不定。我聽人說，成中英提到孫是有些私怨的。

解聘事件好像不○○○○○○○（按：報紙文字無法辨識，以○示意）教

¹⁰⁰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 84。

¹⁰¹ 〈臺大哲學系解聘事件評議〉，《星島日報》，1974 年 10 月 4 日，收於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新聞局駐紐約新聞處檢送紐約華埠星島日報等〉，國家檔案局，檔號：A80300000A=0063=C280212=0001=01=006=0009。

育部長蔣彥士，中央黨部副主任委員秦孝儀，救國團主任李煥都表示，他們對此事真相已有了解。軍方人員原來十分重視，現在也改變了態度。而且沈君山也在為被解聘的人找工作。聽說王想去中研院，沈等一些革新保臺分子正為王找人推薦。¹⁰²

雖然，本篇報導來源的可靠性尚屬疑問，不過基本上可以看到對於一般讀者而言，事情鬧的這麼大，卻又不了了之，當事件公開後，國民黨的反應卻很遲疑，讓人困惑。其中，「軍方人員」所指，似為王昇方面，也從「十分重視」轉為「也改變了態度」。這便使得一般讀者，儘管沒有明確證據，但不由得感到這是一齣使國民黨「也一定很窘」卻又無法公開說明的荒謬劇。

經過數月才「改變了態度」，顯得有些遲緩，但若回到以反共意識為綱的時代，則可以理解。國安局內部一位與哲學系事件無利益關係的中層人員，在 8 月下旬提出的一份「哲學系現況及根本解決之道」簽呈，便可以與此相參。他希望積極加以整頓，對於孫氏即將返美，充滿憂心，提出三對策：

孫返國後與各情治單位頗多合作，對哲學系人事，課程之改進，貢獻良多，孫如決心返美，哲學系可能恢復舊觀，如何確保哲學系改革之成效……

一、上策：促成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辭職，由教育部蔣部長出面挽留孫智燊，並正式任命其哲學系系主任。二、中策：由閻校長限制朱立民權責，防止其延聘成中英或外籍人士來臺出任臺大哲學系系主任。三、下策：臺大立即解聘曾天從教授及講師黃天成，以保持人事上之困擾。¹⁰³

但是他的熱切旋即遭到已經知悉事情大致真相的國安局長否決。該簽呈最後的提案「擬辦閱後說明二以據報方式編函教育部蔣部長密參，以爭取時效」被劃掉，國安局長周中峰批示：

按臺大哲學系問題，雖與國家安全不無關聯，惟如何聘派，究屬學校行政，本局依據片斷情報資料反映之說法看法，不宜逕呈教育部蔣部長。且此一

¹⁰² 〈臺大哲學系解聘事件評議〉，《星島日報》，1974 年 10 月 4 日。

¹⁰³ 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4 年 8 月 23 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無原始公文號：貼紙條碼：063300Z00067。

問題，癥結情節，蔣部長及中央有關首長，均已知悉，本局當仍繼續注意情況發展。¹⁰⁴

到了 8 月下旬，「中央有關首長」都知道了事情真相乃是一樁荒謬劇，知道了孫氏幻想與真實的差距，不需再往下查。正如到了 9 月，國安局中層人員另一份對民眾來函要求整頓臺大哲學系的評估簽呈，也表現出了「均已知悉」的認識：「（該民眾）閱讀後，分別陳函蔣先生及局長，以表現其愛國熱忱，惟臺大哲學系問題頗難以匪嫌論處……」¹⁰⁵這段話，或可看作是哲學系事件的結尾。

而孫氏臨行前夕同具想像力的另一樁奇異檢舉，也就悄無聲息收入了情治檔案，不再掀起同樣的波濤：

孫員與俞書記長敘述美國新聞處及美大使安克志曾秘密約晤學生談話，而且談話中有鼓勵我國學生應學習泰國青年的勇敢，另還詢及陽明山至官邸有何小徑，金山淡海等地是否有出口等。美新處並於 7 月 31 日下午通知數十位大學教授去開會，實際到會僅十餘人，其本人亦應邀前往，會議開始，由美方宣讀印好資料約兩小時，主題為承諾的義務。孫員最後建議：美方似在製造泰國學潮之翻版，我應加強大學師生之心防。我應對美駐華大使安克志加以調查，如掌握有對我方不利之證據，應列為不歡迎人物。

106

四、案情綜觀：哲學系事件在戰後校園政治案件史上的位置

1. 案情綜觀

在 1995 年接受監察院訪問時，王曉波認為，哲學系事件有四重結構：一、

¹⁰⁴ 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4 年 8 月 23 日）。

¹⁰⁵ 國安局三處四科，〈簽呈〉（1974 年 9 月 9 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第三處 (63) 2244。

¹⁰⁶ 調查局，〈致國安局函，續報臺大哲學系改組案（轉教育部人事處函）〉（1974 年 8 月 9 日），國安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原始公文號：(63) 敬(春) 233346。此外，臨行前夕對美國大使之舉報，也從側面說明孫與心廬方面並非一體戰線。當心廬方面仍著力於以哲學系事件的赤色陰謀攻擊教育部-黨部，孫又毫無邏輯地另開反美戰場，顯示其本人的偏執想像力，實超乎黨國各方勢力現實利益計較之上。

全世界學運風潮下，安定與進步的選擇；二、國民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安撫疏導 vs 禁止鎮壓；三、哲學系內部殷海光與方東美兩派之分歧；四、孫的人格結構。他認為，「很多同仁受害，可能跟後兩重結構有關，他們利用我跟陳的政治問題，扣紅帽子在同仁身上。」¹⁰⁷

比較上述基於新徵集檔案之分析，王曉波的觀察已經注意到案件 2 與案件 1 的區別與聯繫。即孫氏本身「利用」黨國體制的企圖。但也由於王涉入國民黨內部鬥爭主要在案件 1，因此，他並未考慮到案件 3。不過，從中點出的國民黨內部鬥爭，則頗有啟發，可以與案件 3 相參照。（臺大調查小組也就此內部鬥爭定位孫氏，但未區別案件 1 與案件 2。）整體而言，王氏的觀察區別了校內跟校外的因素，與其間之互相利用，但是這些不同層次的結構，是怎麼聯繫起來的，則仍然模糊。而根據新檔案的分析，我們現在可以建立較為清楚的整體歷史圖像如下。

1970 年代初期，統治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長期以情治體系控制臺灣社會的治理模式，遭遇了一定的困難、轉型與轉型的困難。長期戒嚴統治已經過二十多年，社會上的新生批判力量逐漸萌芽，黨國依然強大，但也開始需要調治理模式：是 A.安撫吸納新的聲音以維持控制，還是 B.加強監控鎮壓？臺大哲學系的**案件 1**，便顯示出面對新的萌芽的兩種嘗試。而執行上的不順利，也顯示出治理模式轉型的困難。而便在這個黨國齒輪開始有些不合的時間點，偶然成為系主任的孫智彙，以其心理偏執的個人特質，來到具有特殊內部人事歷史條件的臺大哲學系，受命整頓。在孫氏偏執心理主導下，他的反共恐共幻想，打造了**案件 2**。這超出了黨國原先的七分安撫三分鎮壓的設想，成為偏向 A.的教育部-臺大方面的燙手山芋，也帶給孫氏主動接頭的調查局頗多困惑。但對教育部-臺大一方，又不適合直接否定孫氏，儘管以凍結人事方面拖了半年，但〈緊急座談會〉召開後，外界輿論的壓力，使得 A.不易進行，最後以通過孫氏提案，進行停損。只是，後續**案件 3**中，B.一方對 A.的攻擊，仍以此為工具猛烈開展。直到尾聲，B.也察覺到本事件有從功在黨國變成鬧劇的走向，也開始收手。

¹⁰⁷ 王曉波於監察院調查報告的陳述。監察院，《臺大哲學系調查報告》（1996 年 3 月），國家檔案局，檔號：A700000000A=0085=032400=00286=1=001=0022-0023。

從整體觀之，哲學系事件迫害言論自由與人權，殆無疑義，過去調查/研究已經做出深刻的反省。但是，國民黨政權的威權體制，在這個歷史時間點呈現出什麼樣的特質，而有哲學系事件的發生，這與此前此後的（校園）政治案件有何差異，這些問題，仍然有待回答，方能比較確切地掌握哲學系事件的歷史位置與意義。

2. 1974 年變動中的黨國結構：與 1966 年殷海光解聘、1986 年李文忠退學比較

相較於 1966 年 8 月發生的殷海光停聘事件，以及 1980 年代的校園監控，或許可以說，哲學系事件是一個在 1970 年代初期才會如是開展的案件。在 1966 年，臺大校長是更有風骨的錢思亮，被整頓的對象是聲望更高的殷海光，但是錢對中央指令（殷離開臺大，改任教育部職務）的抵擋更加無力，只能跟殷約定「課表照排，但終止上課」。同時，警總直接派人威脅殷，要他接受。1980 年代，國民黨政權對校園監控的人力增加許多，但卻越來越難以掌控數目不斷增加的需要監控的教授與學生。在前者，政府的控制能力極為強大，而要監控的對象則很少，在後者，政府的控制能力在絕對值上，或未衰退，但是對於校園中增長的社會自主力量，則相對值上，顯著不足。前者是以監控鎮壓便可解決一切的時期，後者則是監控鎮壓已經達到能力限度的最後一搏時期。

介於中間，1972-74 年的哲學系事件，顯示出伴隨臺灣戰後社會發展，國民黨政權必須開始面對、乃至爭取在島嶼長成的年輕世代之社會乃至政治參與要求，而開始徘徊於安撫疏導-監控鎮壓兩種策略之間。在這時，監控鎮壓開始顯得不是最有成效的方案，但這時，監控鎮壓也仍然卓有成效。（試比較，哲學系事件中被解聘者，除仰賴政府安排，多不易在社會上找到合適工作，相對於此，1986 年李文忠退學後，服完兵役，便參與勞工環保等社會運動，1988 年加入民進黨。而哲學系事件時，《大學雜誌》短暫開放空間已近尾聲，更不若 1980 年代黨外雜誌越禁越多的生命力）可以說，這個時期，是單一的監控鎮壓的尾聲，黨國兩種路線爭執的開端。但是，校園的自主空間，在這時期，仍不完全是來自社會本身力量的支持，而可能較多來自於黨國內部路線的歧異。亦即，黨國內部預見到此後社會自主可能性，試圖把這可能性納入控制，而形成的空間。因而，其受到黨

國的影響也依然強大。如果哲學系發生在十年前，可能便如殷案簡單粗暴了結，如果在十年後，則可能結合社會上的政治上的校外力量支持。而在 1972-74 年，其空間則取決於黨國兩股力量的拉鋸，而最終也以黨國的意志做出結局。

或許正因為如此，日後對此事件，在評斷是非之際，也會寄予期望與失望。對於 1966 年的殷案，日後很少有人會去非難錢思亮。而對於 1986 年的李文忠案，也很少有人特別去期待當時的校長孫震。隔年因李案而起的「自由之愛」校園運動，已經是孫震所擋不住的了（校方本打算大規模將學生退學，但在輿論壓力下，最後僅以小過處分）。當校園運動與更大的社會動盪變革密切相連，孫震已然不是這個時期會被特別加以評斷的歷史角色。只有對於 1974 年，從日後回顧臺大自由主義學風的傳統，在黨國轉型拉鋸的微小空間中，使人們寄予閻振興期望，又對他最後屈從外力干預而失望。

與此同時，也正是在這個奇異的時間點，心理偏執的孫智燊得以躍上舞臺，展開他的大計。如果是 1966 年，「中央」並不需要另外找人來執行解聘任務，陳、王、趙當會很快被直接處理安置。如果是 1986 年，孫氏編織的赤色陰謀，很快就會在黨外雜誌備受嘲笑，校園中，教授的串連與學生的遊行，也將把事件推向公共空間，而不若 1974 年的各系教授質疑停止於校務會議；如是，解聘任務掀起的波浪，將不是孫氏可以處理。而正是在 1974 年，在黨國兩條路線的遲疑之際，孫氏才可能被起用，然後在這個模糊的空間裡，被利用也利用黨國體制，推行其目標。

3. 超過體制的偏執：黨國意識型態與現實之間荒謬的距離

於此，不若此前純然戒嚴獨裁政治下的悲劇，而此後的民主化運動史詩也尚未展開，1974 年成為一個使得歷史荒謬劇可能上演的時間點。不過，也在此，這並不僅僅是一個心理偏執者引發的荒謬劇。哲學系事件的荒謬，同時也突顯出戰後臺灣黨國體制治理模式的特質。前期，黨國作為獨裁政權的壓制性角色，後期，隨著民主化運動擴展到公民社會，黨國作為被對抗的反派角色；比起這兩個更加清晰的角色，1974 年則展現了黨國自身尋求轉型的困惑與混亂，並在其中，

體現了黨國意識型態邏輯的荒謬。

在這樣的一年裡，一個吊詭的現象成為可能：就目前檔案所見，孫智燊並非出於黨國指示而造就此案，但他卻又完全執行著黨國的世界觀。孫氏以其偏執心理的道德律令，踐行其目標。這個目標與世界觀，以極為荒謬的實踐，展現了黨國宣稱的國度與其治理現實的差距。就孫氏看來，凡是批評政府的，必然都是中共統戰乃至國際赤色陰謀的一環。這完全符合黨國反共教育的灌輸。而他的偏執自我，進一步將現實中對此幻想的反駁，視為各種打壓陰謀。孫氏偏執編織的幻想，不僅不合乎安撫疏導-理性治理路線的期望，甚至也不合於監控鎮壓路線一方的需求，但是，卻又完全以黨國的邏輯開展運作。對於黨國反共國度信念的無條件擴張，使得黨國在發現他的問題時，很難做出合理的處置。

綜觀兩局檔案，黨國威權體制在各個時間點各個層級，都不乏對孫智燊的疑慮。例如，當國民黨青工會提議將趙天儀調職教育部，以便利孫氏整頓改革，校長閻振興卻以已經開學妥適為宜，加以否決，並回應哲學系各教師提議，凍結人事案半年（1973年9月）。哲學系改組的直接上級，教育部長蔣彥士與秘書孔服農也對孫氏的激進有所保留，建議他爭取校內支持，「無為而治」，「不再大事改革」（1973年9月）。調查局從一開始，便對孫氏檢舉存疑，雖然支持整頓哲學系，並吸收孫為線民，卻也另派線民監控（1973年9月）。國安局也在孫氏指控成中英收受哈佛燕京學社款項時，回應那是中研院經手，補助《思與言》雜誌社（1973年10月）。直到〈記要〉公開前，「中央」（應為教育部）仍然要孫氏不要發表成中英問題，調查局也研判該舉報可能與系內人事糾紛有關（1974年3月）。

但是，反共的意識型態，加上哲學系長期作為監控對象的歷史條件，使得情治系統/戒嚴體制很難作到內部揪錯。下至調查局人員根據孫氏線報編製的報告，上至收到這份報告做出指示的蔣經國，以及〈記要〉公開後能夠出現在「媒體」上的「輿論」，都不免陷入這個陰謀的邏輯裡，相信孫氏的舉報為真。以至於最後，形成了極為尷尬、荒謬的鬧劇。當事件公開，陰謀被呈報到更高層，在政治決定下，最能掌握事情真相的教育部的裁量空間又更為減小，只能在上下之間彌

縫。結果只能是，一方面配合孫的要求，一方面減少其嚴重性（不續聘理由多是教學不適任而非赤色陰謀），一方面打發他離開臺灣，一方面讓蔣經國感到事情順利解決，哲學系已經「整頓」。

而也因此，當黨國無法合理處置孫氏時，也就同時突顯出了，黨國威權體制本身的非合理性。由於堅持一元化的政治領導社會方針，在安撫疏導路線這邊，其「溫和」終究有所限度。而在監控鎮壓路線這邊，將整個社會作為潛在的陰謀份子，其監控的精確度只能不斷下降，並造成更多真正開始反對者的增長。孫氏的國際赤色陰謀幻想，於是在他自己沒有察覺之處，點出了兩條路線的失效。三年後的 1977 年，中壢事件揭示了安撫疏導路線的限度。再兩年後的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則揭示了監控鎮壓路線成效之不彰。到了哲學系事件十三年後的 1987 年，黨國終於不得不以解嚴作為新的出口。

而在 1990 年代，當臺大重啟調查，所有當年相關的行政、教育與情治體系官員，對此事件都避而不談，只有自美返臺受訪的孫氏，仍然洋洋得意地，指稱這是一個「政治事件」，認為必須對左派份子加以鎮壓。孫氏「政治事件」的歷史解釋，與加害結構一方、威權體制的官員們完全相異，卻在不同的立場上，與受解聘的受害者們看法相同，這正說明了，黨國體系的意識型態邏輯與現實之間荒謬的距離。

正如《星島日報》上，站在政府立場，同時又加以批評的一則匿名評論所言：

我以為現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已經培養了為國為民服務氣質，如果政府真為不負責任言論所惱，這也可能真正是有關社會發展問題，不能片面論定國民黨完全是為自己權力考慮。限制一些不負責言論，在社會經濟發展現階段可能有些客觀的理由，問題是政府應該如何使社會了解這些理由，不能造成壓制思想傷害人權的後果。¹⁰⁸

在 1970 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治理社會的模式，或主動或被動，有了一些比較接近「現代國家」之合理性的跡象，但是其政權根本上意識形態的非合理性，卻

¹⁰⁸ 〈臺大哲學系解聘事件評議〉，《星島日報》，1974 年 10 月 4 日。

使得這種轉型極為困難。

在最後，不妨以當時調查局檢閱郵件，截獲的一封臺北工專僑生家書，作為結語。當時在臺灣就學的王光，寫信給在香港的父親，寫道：

臺灣學生刻苦用功，非普通人所能，有時和他們說國事，他們對臺灣都沒信心，努力只求出國。我聽一個同學說，臺大的哲學系主任是共產黨間諜。哲學是控制國民思想的學科，而臺灣的最高學府中已被共產勢力所控制，看來臺灣也不會很久了，這只是我對生活的一種觀感，在外人面前不敢說。

109

王光的觀察，指出了在內外局勢動盪下，一般人心中對政府信心不足。同時也呈現出，在這一時刻，當政府不能有效應對批評的聲音，所謂安撫疏導只是私下摸頭而不能轉型為合理的公開對話；此時，所謂監控鎮壓，以陰謀論方式編織政治案件，便反過來強化民眾對政府能力的質疑：如果臺灣最高學府已經被共產勢力控制，這並不呈現出政府監控破案能力的強大，並不能讓人民畏懼，而是，看來臺灣「也不會很久了」。王光的預言，有一半命中，國民黨的戒嚴體制，在十三年後結束；而另一半則不夠準確，在臺灣公民社會的努力下，這個國家仍然繼續存在下去，在戒嚴時期威權體制的廢墟上，人們不斷在尋求、打造著一個比較合理的政治共同體。

五、小結：討論責任的開始和有待日後徵集的檔案

本文對新徵集的調查局與國安局檔案進行分析，對臺大哲學系事件中，先前調查/研究都認為十分明顯卻又沒有材料佐證的「政治外力介入」做出一定的釐清。首先，確認了孫智燊的角色定位：

- (1) 從國安局檔案所見，孫智燊雖然是受教育部指令「整頓」臺大哲學系，但教育部傾向在系務方面處置，而不傾向編織政治案件，兩者之間有所落差。教育部最初主要關注對象是陳鼓應、王曉波、趙天儀，而非如後來捲入十餘人。

¹⁰⁹ 見調查局檢閱王光函：王光，〈致父親家書〉（1974年7月23日），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142。

- (2) 從調查局檔案所見，孫與調查局的關係，乃是孫主動聯繫檢舉擔任線民，確認了孫並非情治體系一員。
- (3) 從〈緊急座談會記要〉的流傳過程進行判斷，孫雖然與心廬的馮滬祥在事件中關係密切，但行動並不全然一致，兩人當非同一體系，基本可以推估孫並非心廬一員。
- (4) 因此，指稱哲學系收受費正清集團經費，成為中共統戰據點，編織國際性赤色陰謀，可以認為並非受命執行，而是孫氏個人心理偏執所致。同時，這一偏執又為馮滬祥所利用而擴大效應。

對於先前調查、研究中顯得模糊的外力介入問題，就此可以做出進一步考察：整體而言，外力並非鐵板一塊，包括 A.黨部-教育部、B.王昇-心廬體系，其介入目標與實際運作也有落差。

- (1) 從前述分析與檔案中教育部材料，孫氏多次言稱受命「中央」，指的是教育部-黨部的期望（外力 A）。主要希望處理王曉波與後續相關問題。
- (2) 但是孫氏編織牽連甚廣，超出教育部-臺大的期待，而有閻振興凍結哲學系人事半年。唯孫氏仍然積極運作，而有緊急座談會，直指成中英，編織巨大赤色陰謀。
- (3) 此機會為心廬體系的馮滬祥利用，與王昇關係密切的心廬體系（外力 B），因為要與李煥相爭，由馮影響參與，將事件擴大、公開，施加對臺大-教育部-黨部的壓力。
- (4) 此壓力使得臺大-教育部決定停損，通過孫氏對多位教員解聘案，同時也不續聘孫為系主任，使孫返回美國。
- (5) 但是孫氏編織案情顯然漏洞太多，最後心廬方面也停止砲火。

釐清兩股外力的具體作用後，本文認為，哲學系事件，是兩股外力與孫氏個人心理偏執的交互作用所致，可以看作三個案件的交錯，這也是過去對「外力」介入不易說明清楚的原因。在外力 A（安撫疏導路線）較為「溫和」的黨國處置陳、王事件的空間中，孫氏利用這個空間，以個人偏執心理編織陰謀幻想。外力 A 感到困惑，而對孫氏問題之進退不定，導致外力 B 利用此契機，利用孫氏的

偏執心理，將事件擴大公開，給予外力 A 壓力，而導致孫氏提案的通過。

如果不是孫智燊偶然成為系主任，而是其他人來執行，那麼牽連範圍應該只涉及最初與學生運動關係密切的陳鼓應、王曉波兩人（可能包括趙天儀）。從黨國角度觀之，其處理亦體現一定「黨國的溫和」，即並不以叛亂罪名送軍事審判，解聘後將為他們安排工作。但孫氏之執行，最終造成眾多牽連，亦是威權體制各方作用所致。此外，若就孫氏個人反共恐共偏執心理，其根源，也來自於黨國意識型態。

如此，就案件性質而言，哲學系事件中，政治外力之迫害人權，並非一開始就全然是一個完整清楚的預謀。但其發展，又可說是威權體制下，體制各層級運作之結果。就此，關於責任之討論，一方面應就個別參與者的行為做出說明，另一方面，亦須注意，各參與者了推動事件發展，又與整體的威權體制密不可分。以下，分為第一線、體制中層單位、體制最高決策者三個部份，試作討論。

(1) 第一線 執行者/策劃者

(a) 孫智燊：

哲學系事件發展為大規模之解聘案，起因在孫智燊個人所編織赤色國際陰謀。一方面，他是教育部與臺大校方協商後起用來「整頓」哲學系的執行者。另一方面，他又超出教育部交待任務，不單是執行者，而添加了個人的陰謀論，並積極策劃推展。後者主導了哲學系事件的走向。¹¹⁰

(2) 體制中層單位 策劃者

(b) 臺大-教育部-黨部方面：

第一、在孫氏到任之前，臺大-教育部已經對陳、王作人事安排，並以孫氏取代趙天儀，交付整頓哲學系任務。

第二、孫氏在 1974 年 4 月公開〈記要〉之前，已經出現諸多言行不穩現象，

¹¹⁰ 另外，孫智燊為成中英所推薦，經教育部與臺大校方商談後聘用為系主任，但成氏反而被孫氏指控，因此孫氏之出現在這個位置上，只能說是歷史的偶然，雖然可說成中英識人不明，但後續事件之發生，則不能歸責於他。

超出教育部交付任務，但是教育部並未積極處理，只加以勸導，仍讓孫氏留任。臺大校長閻振興雖然在 1973 年 9 月凍結哲學系人事，暫時緩和情況，但也未進一步積極與教育部協商以求改變。¹¹¹

第三、〈記要〉公開後，教育部與臺大只顧滅火，以防火勢擴大延燒自己。在蔣經國指示積極整頓、心廬報刊攻擊壓力下，並未承認起用孫氏的責任，向蔣經國與心廬方面澄清孫氏的心理偏執問題，反而為抵抗心廬攻擊，選擇停損，通過孫氏提案，處理其指控，然後將孫送回美國。

第四、善後方面，只有王曉波、趙天儀受到照顧（事件後，王曉波安排成大未果，轉到政大國關中心，趙天儀前往國立編譯館，都是李煥安排。其中，根據閻振興所述，國關中心是他去說情），其他多位受到牽連教員，則不在教育部-黨部的考量內。¹¹²

整體言之，在哲學系事件中，臺大與教育部的角色頗為多面，有配合，有緩和，也有被攻擊與自保。這呈現了威權體制下，身為政府一環，面對異議的複雜處境。而對此處境的釐清，則促使我們思考責任歸屬時，把握歷史的面向，也把握人權與自由的價值追求，一方面考慮他們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探問在體制的限制中他們能夠、應當作到什麼？此外，臺大、教育部、人二室、情治單位之間的互動運作關係，由前述檔案之梳理，可以看到一定的呈現，但整體的制度歷史變遷，仍有待日後進一步清理。

(c) 心廬方面：

王昇長期以來均對臺大思想問題頗為關注，在校內並有與之保持聯繫的學生。和王昇相關的心廬體系，更有許多與哲學系殷、方學派之爭的糾葛。雖然因為檔案材料所限，尚無法指出王昇本人的指示為何。但本事件中，心廬相關成員的參與，

¹¹¹ 此外，林正弘教授指出，資深教授曾天從寫信給閻振興校長，反對聘任馮滬祥為講師，卻為孫所知而於座談會質問曾。此事當為閻所洩漏，他推測或許閻有意推卸責任，顯示「你看你們系上的教授也不推薦馮滬祥。」林正弘訪談，促轉會諮詢會議記錄（2020.2.18）。

¹¹² 亦見林正弘教授指出，1974 年他到美國，遇到國民黨青工會主任王唯農，王對此並未表示歉意，反而把責任推給哲學系自身問題。「本來打算向王唯農說明，哲學系事件純粹是系裡的派系鬥爭，沒有什麼反政府的陰謀。但王唯農反而怪罪起臺灣的人文社會學科的教授喜歡鬥來鬥去。這樣的說法更坐實他們利用哲學系裡的矛盾，來挑起這樣的紛爭。其他部份王唯農就沒有多談，可能認為事情過去了，粉飾太平即可。畢竟孫智燊已經回美國了，王曉波、陳鼓應等人也都安排了去處，其他受影響的人也沒有反抗。」林正弘訪談，促轉會諮詢會議記錄（2020.2.18）。

則可確定。馮滬祥與孫氏往來密切，助長其偏執心理，更影響〈記要〉之流佈，藉機擴大案情。相關報刊亦公開批判攻擊。其舉動，使得教育部-臺大校方承受壓力，破壞教育部一度嘗試壓制孫氏的企圖，最後使得孫氏受挫半年的大規模解聘人事案，終於得以通過。

(3) 體制中層單位 協助者

(d) 情治單位方面-調查局：

在 1974 年 4 月 9 日〈記要〉公開後，蔣經國下令積極整頓，其判斷決策，除了長期以來對臺大自由主義學風的不滿與關切，¹¹³當與同一天收到的調查局報告有關。這份報告又多根據孫智燊編織情報。儘管調查局在事件中，主要執行的只是偵防業務，並無刻意編織政治案件陷人於罪之企圖。但是在反共意識形態下，過於輕率採用孫氏提供情資，產生了偏差的報告。如果該報告內容對孫氏有所保留（如調查局內部研判，孫氏舉發可能與人事糾紛有關）¹¹⁴，或許蔣經國的指示會有所不同。

(e) 情治單位方面-國安局：

從檔案材料觀察，國安局在情治單位方面，位階較調查局高，對事件發展之分析，掌握情資也較多。1973 年 10 月，孫氏指控成中英收受哈佛燕京學社金錢，國安局便指出與事實不符。但是，國安局在事件發展中，並未更積極糾錯，對 1974 年 4 月調查局呈給蔣經國之報告，亦未提出異議。在威權體制中，情治單位屬於監控社會之單位，但亦具有專業化的面向（後者在民主化之後，仍然作為政府組織一部分而存續）。哲學系事件過程中，國安局一度顯示出對孫氏的保留態度，但也受限於整個體制意識型態，正顯示出威權體制內部糾錯機制的矛盾與缺陷。

(f) 情治單位方面-警總：

警總在事件中，主要參與為 1973 年 2 月約談陳鼓應、王曉波，並進行兩人後續

¹¹³ 此前，蔣曾對臺大前一任總教官張德溥談話，希望整頓臺大傾向自由派的思想。張德溥口述，洪三雄採訪，鄭鴻生整理，〈折戟沉沙（上）——張德溥在臺大軍訓總教官歲月的回憶節錄〉，《傳記文學》，79 卷 6 期（2001 年 12 月），頁 102。

¹¹⁴ 調查局，〈臺大大學論壇社舉辦座談會情形〉（1974 年 3 月 21 日），調查局「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0264-0268。

監控。與其後事件發展，直接關係較少。

(4) 體制最高層決策者、體制領導人

(g) 蔣經國：

蔣經國本人責任，可分為兩部份：事件中最高層決策者、威權體制領導人。

第一，是作為整個威權體制之一員——在政治組織上，最高層決策者的責任。目前由於檔案材料缺乏，尚不能斷定蔣經國是：

a. 被教育部順利矇混過關，相信孫成功整頓了哲學系，雖然指控不免有誇張之處，但主要是愛國心切，而孫又因為身心交悴與家庭因素，不得不返回美國。最後對孫召見嘉勉。

b. 其實知道荒謬劇的真相，只是身在反共威權體制中，也不能公開指正，只好把戲演完。

本文認為 a. 的可能性較高。事件後，蔣彥士、閻振興均未調職，也較符合 a.，若是 b.，事情過後，應當還是會加以整治。作為威權體制最高層決策者，被屬下矇騙而毫無芥蒂，似乎更加不合情理。

那麼，在這個假定下，其責任歸屬為何？目前由於缺少全部的永靖會議檔案，蔣經國本身直接介入哲學系事件的材料，只有 146-147 三次永靖會議（且不完全、有塗黑），指示分別為：是否有哲學系事件的調查資料（146 次）、必須嚴加辦理（147 次）、希望留任孫智燊，若不成則臺大哲學系人選須與國民黨青工會商議（148 次）。其中，147、148 兩次，對事件發展有直接影響。特別是 148 次會議支持孫氏態度，與心廬方面的輿論攻擊，共同形成對教育部-臺大校方之壓力，減小教育部之處理空間。儘管蔣經國很有可能是在調查局偏差的情報下做出指示，並且受到教育部-黨部方面情報隱瞞之誤導。但是，作為最高層決策者，無法察覺、做出較合於事實的判斷與指示，亦當不能迴避責任。

第二，作為整個臺灣威權體制領導人的蔣經國。如上述分析，蔣本身也受到威權體制意識型態之約束，而無法察覺其問題、做出合理的指示判斷。但是，蔣

作為體制領導人，也是威權體制中，在政治組織位置上，唯一可以不受到束縛的人。因此，上述造成哲學系事件各原因，孫智燊、教育部-臺大校方、心廬、各情治單位，考慮其所受反共意識型態作用，那麼作為體制的領導人，蔣經國同時也當負最終責任。

以黨內兩股路線問題觀之，1974年4月事件公開後，心廬方面展開公開攻擊，但是目前材料所見，蔣沒有做出任何指示。對此，蔣似乎只視為安撫疏導與監控鎮壓兩股路線的差異。從蔣的行事風格看，這也是他處在安撫-監控兩股路線之上的權力平衡措施。他並未察覺，這種權力安排，對於掌控社會思想狀況，並沒有好的成效，也沒能真正因應現實，反而在臺大哲學系事件中，呈現出荒謬劇與不了了之的尷尬結果。因此，蔣經國也沒有從本事件中，作出任何明確的反思與判斷，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在人生晚期做出決定。

因此，既身為黨國組織一員、又作為黨國體制領導人，本文認為，蔣對於整起事件，當負事件發展上最高層決策的責任，與威權體制的領導人責任。過去，由於黨國體制內部運作材料不足，無法進行分析，受害者方面看法，多直指「蔣經國就是主謀、第一號劊子手」，¹¹⁵主要是就後者立論。而經過兩局檔案之分析，「最高層決策與體制領導人」，當可更完整地說明蔣的角色，並見到整個威權體制的運作邏輯與其矛盾。

最後，亦須說明，本文僅為階段性的報告，根據新徵集情治檔案的解讀成果，對案情做出大致說明與推估。整個事件的完整歷史圖像，尚有待進一步探討。除了上述新出土檔案，相關單位檔案仍有欠缺。特別是關於黨政核心人士參與的「永靖會議」相關檔案，從中當可對上述責任評估做出進一步的史料支持與修正。希望透過日後檔案徵集，予以補充：

- (1) 國民黨知青黨部檔案（由於教育部長兼任知青黨部主委，雖然教育部檔案已經銷毀，國民黨部檔案或能見到相關線索）、青工會檔案。
- (2)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檔案（或有心廬方面資料）。

¹¹⁵ 薛翰駿，〈臺大哲學系事件受害教授李日章：加害主謀就是蔣經國〉，「沃草」網站，2019年4月1日。網址：<https://musou.watchout.tw/read/jURHMdsrsglXgJJcsESi>，擷取時間：2019年10月26日。

- (3) 調查局檔案其他卷宗(例如,局長參與五人小組的記錄便不在本次卷宗內)。
- (4) 警備總部檔案(除約談陳鼓應、王曉波部份,目前從調查局、國安局檔案並未見警總在事件後半的參與,但同一時期應當也有人員派在臺大進行偵控)。
- (5) 國家安全局與國家安全會議檔案(其中或有永靖會議的完整資料)。

此外,本文撰寫過程,亦就檔案中的新發現,訪談部份相關當事人。惟因時間與人事所限,未能完全。特別是位於事件核心的孫智燊、馮滬祥二位,仍未及訪談,亦期望在此階段性成果上,日後能予以補足。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

國家安全局檔案「臺大哲學系事件」卷宗

國家安全局檔案「王曉波」卷宗

二、報紙

《聯合晚報》

《中國時報》

三、台大哲學系事件先前調查報告或研究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臺北: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自印本,1995年5月。

監察院，《臺大哲學系調查報告》，1996年3月。

游欣璇，〈臺大哲學系事件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6月。

四、回憶錄、口述訪談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

張德溥口述，洪三雄採訪，鄭鴻生整理，〈折戟沉沙——張德溥在臺大軍訓總教官歲月的回憶節錄〉，《傳記文學》，79卷6期-80卷1期，2001年12月-2002年1月。

馮滬祥，〈追憶經國總統與王昇將軍〉，《傳記文學》，90卷4期，2007年4月。

趙天儀編著，《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臺北：花孩兒，1979。

劉金獅等口述，《白色聲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第一輯》，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1。

薛翰駿，〈臺大哲學系事件受害教授李日章：加害主謀就是蔣經國〉，「沃草」網站，2019年4月1日。

林正弘訪談，促轉會諮詢會議記錄，2020年2月18日。

游祥洲訪談，促轉會諮詢會議記錄，2020年3月16日。